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重读《我在故宫看大门》

一位持不同意见者的“西行漫记”

“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

——高华访谈

永田洋子和联合赤军事件

立场与学识

忘了它吧，这是唐人街

我们的大学怎么了？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 庆 言 一
汪 伟 扬 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汪 伟

观察员

写作: 朱 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 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 良(北京)
严 飞(美国·旧金山) 刘 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 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扬 克(德国·图宾根) 孙传钊(上海)
燕 舞(北京) 灵 子(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翻译

吴万伟(武汉)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 赵 林

2011年10月 第5卷第9期

总第49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 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 观点尊重个人趣味, 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 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 对于相关部分, 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 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 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 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 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 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 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 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 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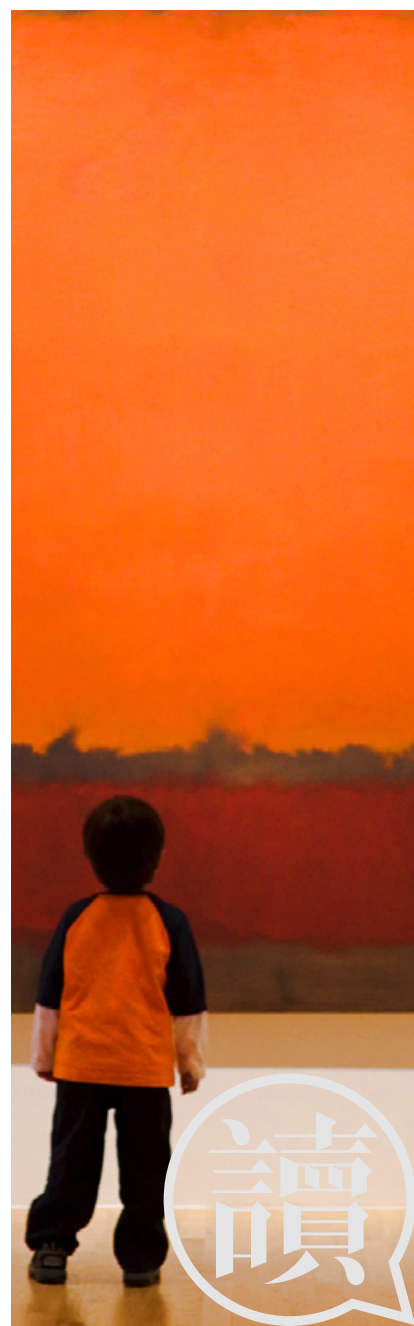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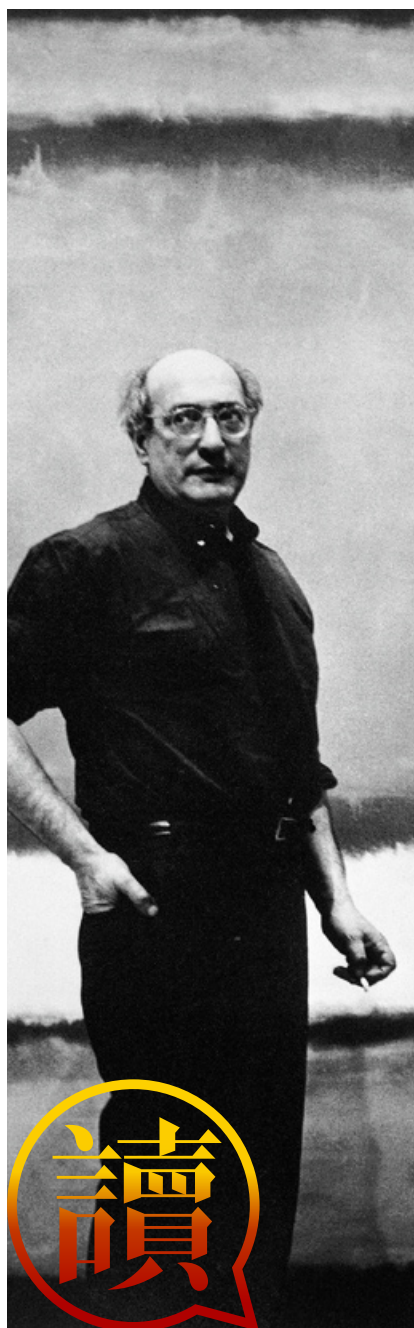
10月底到11月初，从北京到上海，整个东部中国，都笼罩在潮湿肮脏的雾霾当中。到底是严重污染所致，还是单纯的气象原因，至今争执不下。鉴于中国的环境监测机构对直径2.5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不予监测——尽管这类颗粒对人的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虽然雾霾严重，这类机构仍可理直气壮地播报空气质量良好。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种。虽然完成了飞船和空间站的对接，并且正就是否援助欧洲进行谈判，但国民的身体感受总是与国家的辉煌成就脱节。

本期杂志上线时，《独立阅读》书系第一辑已在各书店上架。本辑包括《前卫之痒》（刘柠）、《寂寞者的观察》（凌越）、《重返公共阅读》（王晓渔）和《意义的疆场》（成庆）四册，请各位《独立阅读》的读者们批评指正。



目录

封面用图
orange & yellow
Rothko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经济 • 苏小和
写作 • 朱航满
思想 • 成庆
文史 • 王晓渔

001-020

书评

• 戴新伟
重读《我在故宫看大门》
• 王晓渔
一位持不同意见者的“西行漫记”

021-034

访谈

• 灵子
高华
——“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

035-048

随笔

• 刘柠
永田洋子和联合赤军事件
• 孙传钊
立场与学识
• 罗四鸽
忘了它吧，这是唐人街

049-072

译介

• James Piereson
我们的大学怎么了？

073-083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前段时间,有报道说最近读得仔细的书,首先是《加图决策者手册》(加图研究所著,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10月)。

哈耶克在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解释了为什么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像分散的市场过程那样有效地利用知识。而爱泼斯坦在其著作《复杂世界的简单原则》中,也分析了复杂社会是否需要更复杂规则的现象。爱泼斯坦的观点认为,随着人类事务的日趋复杂,法律制度就需要发展得更为复杂。其结果是距离真相更远。事实上,当人类事务更加复杂,新技术不断涌现,人们恰恰需要将简单的法律规则置于视线之内。可惜的是中央集权体制总是不明智,试图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计划模式来管理社会和市场。但经济学告诉我们,协调负责的经济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基本上都存在于社会之中,市场之中,而不在所谓的高层管理者。因此,为了使得经济效率的最大化,管理者,也就是政府,惟一要做的事情是,把市场的决策权移交给社会,移交给市场。

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价值观,就是加图管理手册的核心方法论。分权和限权是如此重要。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市场运转,这都是两条终极法则。美国过去200多

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限制政府权力的历史,当然,也是一部市场不断展开的历史。其结果就是,美国的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在趋近于每个人的自由,有限政府和经济繁荣的目标。

加图研究所的员工们认为,这是一种普世的经验。有趣的是,CATO在美国不过是一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间智库,但这些年却一直在智慧的层面,或者说是在价值观的层面和美国政府博弈,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到布什政府,再到今天的奥巴马政府,CATO一直在怀疑,在批评,他们和美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我们很高兴与两党政府在扩展自由和限制政府





方面进行合作，我们与克林顿政府在自由贸易、福利改革和社会保障方面改革的起步阶段有合作，与布什政府则在减税、回应911袭击、健康储蓄账户、移民政策等方面合作，如果奥巴马试图扭转布什政府遗留下来的那些糟糕的错误政策，有意推进和平、自由和繁荣，我们也期待和奥巴马政府合作”。

这听上去几乎像一个巨大的组织的外交辞令，不卑不亢。想起中国国内诸多NGO组织的狼狈逃窜，不免有些悲伤。

读得仔细的第二本书，是罗斯巴德的《银行的秘密》（李文浩、钟帅等译/杨农审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罗斯巴德对自由的坚守，是市场自发秩序的陈述，一直是大音希声。这本书虽然在圈子里博得喝彩，但在大众读者层面，尤

其是政府管理层面，依然是人迹罕至。

我想说的是，即使在现在，即使在中国，金融危机一直在蔓延。这是一场由管制、补贴和货币干预导致的危机，如中国这样的国家，依然采用这些方法来抑制危机，当然是南辕北辙。几乎所有人都被民粹主义经济和政府超发货币的刺激诱惑了。按照罗斯巴德的解释，中央银行的存在是危机的源头。美联储或者中国央行的信用扩张政策，才使得各种货币泡沫成为贷款，进而引发漫天的金融危机。

市场干预主义因为携带这看上去强大的公权力，越来越成为经济的方法论，更大的危机在积累之中。在美国如此，在中国，更是如此。历史的教训从来不被重视，更何况中国人根本不读历史。罗斯巴德的陈述就是如此的惊悚，让懂一些市场发展的人坐立不安，可惜这些人手无缚鸡之力，因为只能望洋兴叹，在纸上写上一些常识，给自己看。

泛读的书也算比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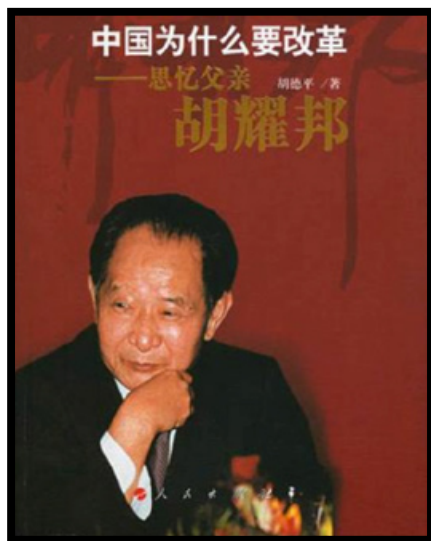
比如胡德平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由胡德平先生提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样的命题，一定立足于一个前提，这就是胡耀邦当年未竟的改革梦想。这是一个当下令人遗憾的中国现实，今天高居其位的官僚，当年几乎都是胡耀邦的追随者，他关于历史反思的行动没有做完，他关于思想解放的构想没有深入，他关于市场经济的

想像没有展开, 还有他的廉洁, 他的率真, 渐渐地成了一个国家用于怀念的符号, 但却不是行动。不能过高要求改革, 回到胡耀邦当年止步的地方, 重新启动改革, 这个国家就有希望, 人们就有自由。

其次是王晓朝的《经济与伦理》。对于任何后发国家来说, 发展经济一定会伴随着古老的伦理追问, 似乎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伦理道德沦陷, 而不是人们过于倾向于伦理诉求, 以至于遮蔽了一个另外的世界。所谓一叶障目, 无论是经济, 还是宗教, 无论是政府, 还是民间, 与伦理有关的追问, 一致都是一个唾手可得的问题。的确, 道德审判的门槛很低,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轻易进入, 但是人们显然忘记了, 最大的伦理乃是对人的普遍的尊重, 而我们能够看到的各种看上去很美的伦理, 很容易就变成了一种对人的奴役。

阿伦特《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是汉娜阿伦特的演讲、报告和随笔合集, 主要探讨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独裁政治下恶的本质, 以及在这种背景下的道德秩序与人类责任。韦伯曾经陈述, 一个政治家必须具有责任、视野和激情三种品质, 阿伦特的工作, 主要也是在这个维度上建构。

西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 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齐安儒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中国人对启蒙主义的认识, 主要来自法国, 但英美的启蒙运动, 才



真正落实到了人的怀疑与建设。人最大的使命是认识自己, 在这个问题上, 英美历史传统, 尤其是改革宗之后的英美传统, 做得足够彻底。

萨森《全球化及其不满》(李纯一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年7月)。全球化的确让全世界的信息资源和市场资源能够形成一种最大范围的自由流动, 这是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交换理论的大面积呈现。对于欧美这样已经在200年前就追求全球自由贸易的国家而言, 开始反思全球化的弊端, 显然是有益处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人的行为足够完美, 全球化也不会例外。但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 至今连市场经济体系都不能建立的国家, 反思甚至抵制全球化, 就有些矫枉过正的奢侈了。

高全喜的《立宪时刻: 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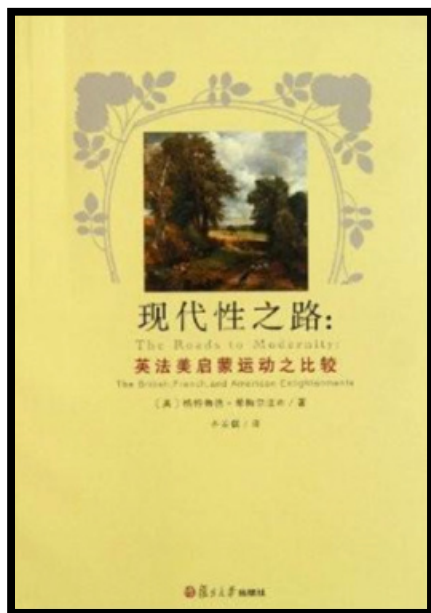
月)。晚清之终结,并不是教科书呈现的黑云压城,革命之火四处燃烧,主流的历史教科书害惨了我们。事实上,晚清的逊位,可能是一次不可多得的“中国版光荣革命”,是一次中国有史以来成体系的宪政行为,在从晚清的经济走向,到知识分子走向,信息流动走向,都可以得到见证。可惜这样的光荣革命,没有在一个宽容的环境里继续演绎,仇恨的革命将中国人带进了深渊。

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当希特勒在经济上大肆铺张高迈的计划经济,在人权问题上大肆屠杀犹太人,在军事上试图奴役整个人类,作为德国人的朋霍费尔,坚定地 from 自由的美国回到德国,他给自己设定的使命,就是暗杀希特勒。可惜功败垂成。但无论如何,朋霍费尔对人类公义的坚定和勇气,都是人类历史最勇敢的篇章之一。

还有本杰明·格雷厄姆《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译科、杨崇猷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8月)。当本杰明在商品和货币之前冠以世界的定义,这意味着人类走入了一个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换的时代。商品的世

界性已经是一个事实,相信货币的世界性同样为期不远。那些靠在一国范围内通过行政的手段操纵货币供应的政府,为所欲为的时代就要过去,只有货币的非国家化,货币的自由交换,才能真正将人类带进更大范围的市场经济时代。

最近读书的确很杂,其实主题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所以,杂,似乎也在情理之中。Q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gmail.com)

2011年5月7日 三联书店

前段时间,有报道说北京的三联书店将部分店面出租出去了。据说实体书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三联也不例外。这次到书店,果然见店旁所开的店铺就是京城有名的雕刻时光咖啡店,而步入书店内,以前二楼的艺术类图书区消失了,据说也成了咖啡厅的一部分。在三联书店的楼梯上读书的独特风景,因为有了通往二楼的去处,也就没有过去那样地壮观了。在书店的地下特价区,买到了夏志清的文集《文学的前途》,半价,略有残痕,但并不影响阅读,此书收入“三联精选文库”之中,由上海学者陈子善编选;大致翻阅了一下书后陈子善的后记,才知道此书原为台湾林海音创办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系夏志清的第二册中文著作,已连续印刷过五六次,此次在三联出版删去了原书中的两篇文章,分别为《一九八五年来中国大陆文学》和《姜贵的〈重阳〉》,其他个别字句也有所删节。特价区还有董桥的散文自选集《从前》,系三联出版的“董桥自选集”中的一册,本打算购买,但书品实在不佳,且我素不喜欢三联的这个版本的版式,过于稀疏不说,其中的花纹点缀也实在是影响阅读的效果,后来还是放回到原处去了。

在港台澳书架上看到香港天地图书公



司为董桥所出版的自选集《旧情解构》(香港天地图书,2002),精装,繁体,竖排,品相极佳,定价为港币90元,书店标示为人民币99元,拿在手里好半天,但还是喜欢这种典雅舒服的品相,终于决心拿下。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此书为学者刘绍铭所主编的“当代散文典藏”之一,自然是足本了,因为大陆出版的不少董氏文字,几乎都有所删节,从而印象中的董桥,仿佛便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遗老遗少一般,实则还是很不一样的。在书店里粗略翻过几篇文章,其中有谈论时事的篇章,也有谈论历史的篇章,均是大陆版本所不曾见到的;还有不久前

在网上看到四川学者龚明德曾言及三联出版的董桥著作《这一代的事》中的文章《春日即事》，也有所删节，我翻阅这册著作，遂见确有大陆所删去的文字，其中一句为：

“翻读《人民日报》，闷气扑鼻，一无所得，急弃之于字纸篓中！”

随后又在新书架上选取一册著作，系英国作家罗杰·塔厚儿（ROGER TAGHOLM）所撰写的《漫步文学伦敦》，为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但一直未曾买到，现正好收下。此书的副题为“25条带您深入探访伦敦文学遗产的步道”，对于了解英国文学可谓别出心裁，值得借鉴。该书封面系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在其伦敦故居前的雕塑，手中所拿应是一册由他编撰的字典，面露微笑，让人很能感受到英国文学典雅与渊博的一面；而该书作家在序言中谈及英国伦敦的名人故居都有蓝牌标志，具体名为蓝徽章，由皇家艺术协会（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于1867年在靠近牛津圆环区的霍利斯街即拜伦的出生地点上，嵌装了第一面徽章，之后又分别由伦敦郡自治委员会、大伦敦议会等机构颁发，1985年改由英国遗产协会（ENGLISH HERITAGE）颁发并延续至今，现已有700面徽章，其中中国作家老舍在伦敦的故居也获此殊荣。

记得前不久上海《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一位中国学者写他与妻子在伦敦寻访老舍故居的经历，而他并没有写到能够

拥有这面徽章的详细标准，这册《漫步文学伦敦》中便有所介绍，不妨抄录如下：“一要有合情合理的根据，让人相信他们是其多数的同业成员都视为卓越的人物；二他们要对人类福祉有重要、正面的贡献；三他们还要有独特、卓尔不群的个性，让见多识广的过路人，立即就认出他们的名字；四他们应获得这样的认同。”这很让人想到我们在文物前用水泥浇铸的各级文物单位的保护标志，真是粗糙的可以，但能拥有也算是荣幸了。诸如北京，就很值得也写出一本这样的散文著作，但实际上很多的历史遗迹，早已被人为的消亡了，据说三联书店附近便曾有著名学者陈梦家和他的妻子赵萝蕤曾住过的四合院，系明代时期的古建筑，虽有多位知名学者和作家极力声援保护，可惜几年前还是被强行地拆毁了。

2011年5月11日 汉学书店

朋友S告知我北大有挪威著名汉学家何莫邪（Prof.Christoph Harbsmeier）的讲座，系北大胡适人文系列讲座之一。北大我很久不去，因此也打算借此旧地重游。胡适人文讲座之前也有所耳闻，似乎以邀请国外知名汉学家到北大来演讲为内容，从去年北大中文系成立100周年开始举行，到今天似乎已经快一年的光阴。记得第一讲便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演讲，可惜我那时未在北京；

而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讲座系列，以胡适命名，可谓贴切，也有对于胡适在学术界地位的认可。胡适曾在北大担任中文系教授，抗日战争后还一度担任北大的校长，尽管没有出任，但无论北大对于胡适，还是胡适对于北大，意义均是不凡的。胡适在国际学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曾荣获36个世界各地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的身份早已代表了学术的一种贯通中西的气度和胸襟，但遗憾的是，如今的北大对于胡适的态度，总是显得有些躲躲闪闪，旧有的影响至今存在，即使如北大这样开风气的地方，竟也不能例外。

讲座完毕后，与S从教室出来，便直奔北大西南角的几个地下书店去看书，在其中的博雅堂书店，我买到《万象》杂志2011年5期；又在旁边的汉学书店，买到止庵编选的《周作人集》（插图本）上下册，这套书系花城出版社的“大家小集”之一，因为打折，而我又有收集周作人文集版本的兴趣，于是还是拿下了。在书店翻阅了一下《万象》杂志，见封二有胡适的照片，神采飞扬、年轻潇洒，照片上的胡适手持折扇，面露微笑，身穿中式对襟衣服，似乎在园林的古亭下休息，据照片下的介绍，此照刊载在SINICA（《汉学》）1932年第7卷的第216—217页之间的插页上，图版第21，第263页上又有说明为：“图版第21是年轻时候的胡适教授的照片。由DREIER女士拍摄。”与这张照片所对应的是本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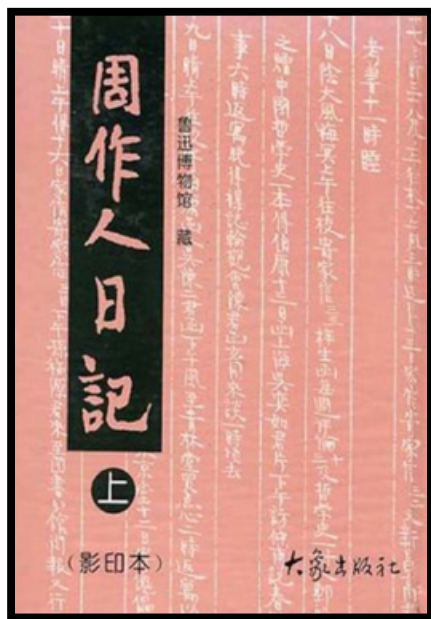
杂志中由李雪涛所写的文章《不做一只不舞之鹤——有关胡适获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几份史料》，我后来读了这篇文章，原来作者去年通过当时北平的一份英文报纸《华北时事日报》（THE PEPING CHRONICLE，1932年9月23日），发现有胡适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这一荣誉后，德国大使馆为胡适举办隆重的招待晚宴，这份报纸刊发了报道通讯，并同时刊发了由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MANN）所发表了祝词，以及胡适所发表的致答谢词，而这些史料均为第一次面世，对于研究胡适自然十分珍贵。

汉学书店以出售文史类著作为特色，书店装饰倒是有些古雅，店名竟也是季羨林先生所题，显然要比其他两家书店看着要更为有文化品位一些。从书店出来，天尚早，我和S便信步在北大校园里散步。我们从畅春园穿过去，经过一段幽深的小径，到达未名湖，一路上见到北大校园内花团锦簇，草木扶疏，颇有欣欣向荣之气。中途，先后遇到了李大钊和蔡元培两人的塑像，均为1977级与1978级的北大毕业校友捐助建成，这倒让我想起台湾作家李敖2006年到北大演讲，曾在公开演讲中表示他要给北大捐款，用于给胡适先生建造纪念塑像，但似乎至今也没有实现。不过，S告诉我，他之前偶然在网络新闻上获知，这座胡适的雕像即将完成，并将由北大校方安排并择地安放。但愿这个消息准确。从北大

出来，我一路上都在想，如果真的要为胡适树立塑像，不知道会将安排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最为合适的地方，便是北大的图书馆前了。今年还是胡适诞辰120周年纪念，这塑像若真能如愿完成，也算是对于这位北大校友的一种迟来的纪念吧。

2011年5月14日 万圣书园

到海淀访友后，时间尚早，想到这里距离成府路较近，便准备顺便去万圣书园看看书。每次我到北京，只要时间允许，万圣还是必去的地方。万圣书园取名于西方的万圣节，诗人西川则将此店名发挥为，每本好书都是一个圣人所在，也可谓贴切又诗意。书店由知名学者刘苏里独立支撑，特点在于书店的定位为只销售严肃的学术人文著作，因此所有书籍既有严格要求又尽量齐全，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不曾见到的学术与人文著作。据说每册进店的著作都是要经过刘苏里的认真判别的，正如梁文道在文章中所谈，万圣书园是没有垃圾著作的干扰的。由于万圣书园的图书折扣很小，而且还必须持有会员卡才行，因此，进店前我便抱着尽量只看不买的心态，先在二楼的书店入口前驻足欣赏了很久特设的导购橱窗，特别是“建议阅读”这个橱窗，很能见识到书店的风格和态度所在，诸如以下几册著作：《蒋经国传》、《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古典政治理性主义：施特劳斯思想入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



的五条道路》、《法权现象学纲要》、《波斯帝国史》、《苏格兰启蒙运动》、《让人民自由》、《殉道史》、《统治史》、《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想左与右》、《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保罗·策兰诗选》，等等。

进书店后，先在杂志区拿到了《万象》第一到第四期，这份杂志曾连续数年订阅，今年改订新闻刊物，但颇为后悔，因此只能在书店零散购买了，幸亏在这里还能买到，前几日去北大的博雅堂书店，只买到了最新出刊的第五期，据说是因为买的人太少，全都退掉了。在新书区见到了花城出版社最新推出的“书蠹丛书”，分别有止庵的《比竹小品》、谢其章的《书呆温梦录》以及赵国忠的《春明读书记》三册，均为小开本的精装本。因为都是有关现代文学的书

话文字，均为我所关注，适合平日闲翻，也就全都买下了。又浏览了一下文学区的现代文学专柜，在架下的旧书堆里翻到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的《周作人日记》，共三册，这套书由鲁迅博物馆所藏的周氏日记影印，两次印刷，也不过2580册。我寻觅此书久矣，没想到今日偶遇，虽然定价昂贵，但还是要拿下的。而其他诸多新书，因为折扣相比太低，这次自然是要忍痛割爱了。结账后，发现竟消费几近300元，其中《周作人日记》因为是2006年以前出版的旧书，收银员态度坚决，一点也不打折。看来，万圣还是很自信的。之前我还替刘苏里和他的万圣书园担忧，看看我这种早有心理准备的人，也没有抵挡住诱惑，其实多少还是有些杞人忧天的。

在书店里翻读了谢其章的随笔集《书呆温梦录》，收有文章《毛边书是阅读的反动》，写他也偶尔收藏毛边本，其中便有书话大家姜德明先生赠送给他的几册毛边书，计有《北京乎》、《余时书话》以及《书边梦忆》等著作，特别是《余时书话》一册，初版只印了1500册，其中毛边书也只做了100册，可见其珍贵。而他自己的一册著作《漫话老杂志》，曾请编辑做过10册毛边书，据说现在网上都已经炒成奇货了。为此，他也颇为留意毛边本的情况，“上海译文社最近出了一系列精装毛边本，做工很精致，内容又是我所喜欢的，当即在当当网订购了其中的《美国散文精选》，其中一

篇《古宅琐记》，最初读的是北岳文艺版，那时的书做的真够粗糙的，但是那时读书就是读书，不大关注书的外貌。”而止庵在他的随笔集《比竹小品》中，收有《也谈毛边书》一文，竟也提到了这册《美国散文精选》，“是以我对这种玩意儿一向不大当回事儿，朋友送书给我，我宁肯要光边的。偶有例外，譬如前不久面世的扬之水著《奢华之色》，毛边三面均隐于精装书壳之内，堪称精致；又《美国散文选》和《培根随笔》，书页上下切光，留书口不裁，亦算漂亮。”

真是堪称奇遇。从万圣书园出来，到对面豆瓣书店里，便一眼看到这册《美国散文精选》，自然是立刻拿下。这册《美国散文精选》由山西大学教授高健翻译，收文48篇，其中包括有富兰克林的《静生箴言》、霍桑的《古宅琐记》、梭罗的《垂钓》、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等等，真可谓名家名文一手在握了，而且整本书的装帧实在优雅，封面用乳白色的精装硬纸，除去两三行隐约可见的刻印体英文，以及必要的出版社、中英文书名和译者名目之外，还有就是一帧印刷极好的小幅版画，整个设计简洁、清雅，令人过目难忘。再读后封上的出版介绍，竟也是典雅与妥帖的大家手笔，不妨也抄录下来：“本书为北岳文艺出版社所刊印的《美国散文精选》（1989）的重印本。重印的目的出于以下考虑：据我们所知，该书自发行以来即深受国内外（包括港台地区）读者的广泛欢迎，但

由于当年印数过少，且又祈未重印，目前书市已绝迹，致使购书者每每废然而返。有鉴于此，我社决定重刊此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并使优秀译本得以再获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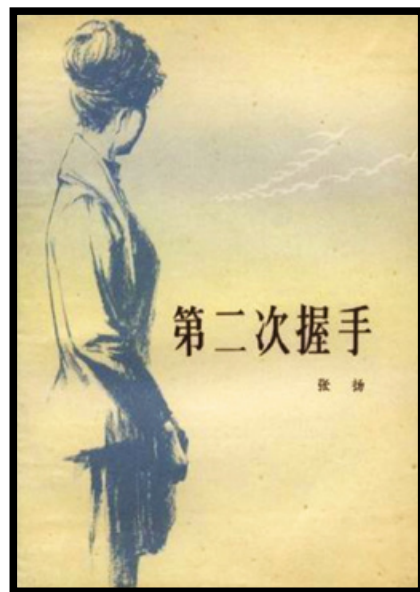


观察员 成庆（上海, veron.cq@gmail.com）

近段时间，小悦悦事件在网络与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之所以如此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两岁幼童被碾压的现场视频画面让人生出不忍之心，更为关键的是，路过的十八名行人无一施以援手似乎让这起事件成为全社会道德水准的验金石，一番检讨国民道德性的社会舆论由此轰轰烈烈展开。

对于这一问题，舆论大体分为两派，一面强调制度之“恶”压抑了“善”的生长，一派则认为人心的冷漠刻不容缓，急需以道德教育加以救济，在这两派声音中，前者往往认为后者颠倒因果，后者则会认为，前者只是将政治议题粗暴嫁接在道德议题上，非但不足以解决道德人心的问题，反倒可能加速暴戾之气的滋养。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无什么特别看法。对于前者，我当然持以理解的态度，毕竟司法制度的判决的确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助人善举，但对于后者，却隐隐觉得更觉有某种迫切性。关于道德教化，我就曾试图在自己的书架上寻找到一些有点“卫道气味”和具有“非批判性思维”的书籍，但举目望去，除了宗教经典之外，在公共阅读方面，几难寻找到一本心平气和谈论道德、教化的书籍，而更多的是以理性、分析、逻辑、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批判与反思，



可见我们这代人，虽直至今日仍受体制戕害，但因此而爆发出的“批判性格”，却是根深蒂固。

这也让人回想起少年时影响我的一篇文章与一本著作。一篇文章是梁晓声的《京华见闻录》，开启了我对毛时代与政治怀疑的思路；一本著作则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让我对所谓的“民国范”的爱情有了某种程度的少年想象。照理说，这一文一书，分明是《钢铁是怎样炼成》中的保尔与冬妮娅的各自化身，前者号召人去批判社会，后者则试图让人相信人与人的真实情感（小资产阶级情感？）。简单一点说，前者代表“怀疑”与“反抗”，后者代表“宽容”与“信

任”，如此看来，这三十年于我人生的教育，显然前者更为凌厉迅猛，后者却往往是一片空白。

或许，今天的年轻人也会面临同样的精神困惑？

还是回到政治议题上吧，《独立阅读》曾推荐过《**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李启成点校，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4月），起初我并未细读，只当时寻常的政治记录，但近来翻阅，发觉可议处甚多。

或许常人很难想象，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晚清资政院院会期间，民选议员的表现超过今日国人对政治运作的想象，不仅当时媒体舆论多有报道，且有所谓“资政院三杰”的说法。三位民选议员，江苏的雷奋、湖南的易宗夔与罗杰在资政院里表现亮眼，并且大出风头。据统计，雷奋在院会期间共发言146次，易宗夔发言则高达419次，而罗杰也有138次，相比大多数钦选议员几乎空白的发言记录，民选议员的表现无疑令人刮目相看。更为重要的是，资政院提出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弹劾内阁议案，“责任政府”的观念经由众多留日的民选议员公开提出，而且成为精英分子的政治共识，就连钦选议员对此观念也多附议，可见“责任政府”绝非多么复杂的政治理念，关键之处仍然在于，社会有无与权力拥有者谈判博弈的力量，要知道资政院的背后，是引诸多立宪团体与地方咨



议局为后援，如无平民社会的进步，或许就无上层精英政治的改良，不过这一逻辑今日却被颠倒过来，不谈社会建设而去奢谈精英政治，实在是错估形势。

在微博上曾经爆发过“传谣”与“辟谣”的舆论拉锯战，至今仍可经常看到新浪官方不遗余力地发表义正词严的辟谣声明，而网络上各种假借名人之口所流传的“名人政论”，经人考证，大多也皆为伪造。政治谣言的流行，本身不算什么新鲜事，如最近出版的吕宗力的《**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就讨论了汉代的谣言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作用，里面曾提到东汉光武帝曾建立起一个以民间歌谣为基础的舆论监督制度，即“举谣言”，可见古代皇权并不畏惧“谣言”，反而是借此了解民情、民意，而正是这一制

度，让东汉年间产生一批名臣，吏治宽松，百姓乐业，结果“谣言”未成妖言，反倒产生一批颂扬地方吏治的“良言”。不知今日舆论监管者，可了解此番道理？

本月得空，曾前往南京金陵刻经处一游，金陵刻经处在历史上虽名重一时，如今却淡出公众视野，早年的印刷、流通佛教经典的功能如今也已经大打折扣，成为某种传统印刷工艺的展示之地。关于金陵刻经处，学界关注并不多，罗璋曾有《**金陵刻经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7月）一书出版，但此书的文献研究风格，大概也只适合专业研究者阅读，对于那些想了解金陵刻经处在佛教史与近代知识分子史

之意义的读者们，实难一窥堂奥。走在刻经处的院中，在纪念仁山先生的“深柳堂里”，可见对联“仁山渐秋逸渐行渐远，讲学以刻经以久以新”，金陵刻经处的学统从对联中一目了然，不过仁山先生行归净土，欧阳竟无学归唯识，吕秋逸则以“现代佛学”为归宿，三人旨趣其实也是大有分别，欧阳竟无虽然继承了杨仁山的学脉，但因倾心唯识，而与金陵刻经处的传统出现分歧，以致后来独立出来成立内学院，开启了近代“学术佛教”的大门，而这一举动，也深深影响了近代知识分子对待佛教的态度，甚至让知识分子认为佛教几可等同佛学，此一大转折，直至今日，仍未得到澄清。❶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1975年，一位兵工厂工人和一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相遇。当时前者二十来岁，后者六十有余，但身份和年龄没有构成思想交流的障碍，两人由此开始了三十余年的交往，风雨无阻。老教授是周辅成先生，小青工是赵越胜先生。赵越胜在《燃灯者：忆周辅成》（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里回忆了两人交往的细节，几近完美地实践和示范了“薪火相传”的精神。在我看来，与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辅成尤为推举拉波哀西《自愿奴役论》的观点，要想改变受奴役状态，国人“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自己不反对自己”，这似乎是一个退无可退的底线，但是在鼓励服从以致盲从的年代，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需要付出沉重代价。

抗战时期就与唐君毅、牟宗三等朋友创办《理想与文化》杂志，周辅成可谓德高望重，但因为不合时宜，逝世时校方全无表示。赵越胜从兵工厂转入中国社科院工作，并创办在80年代北京思想界具有影响的沙龙，随后去国离乡，从事丝绸生意，阅读与写作再次成为业余爱好。一位“处江湖之远”，另一位“乘桴浮于海”，这或许就是“燃灯者”的命运，但“回也不改其乐”。



读着《燃灯者》，常常想起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那些在黑暗时代依然内心明亮的人们。他们既没有逍遥地“避世”，也没有汲汲于“入世”，而是做一名在场的旁观者。阿伦特在《责任与判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里这样说：“理解、反思政治而不必是所谓的政治动物，这确实极有可能。”

在《责任与判断》里，阿伦特思考的依然是“黑暗时代，个人何为”的问题。“你为什么参与屠杀？”“我只不过是服从上级的命令。”这种问答常常出现在二战之后的纳粹审判中，也几乎出现在任何一次类似的审判中，比如对红色高棉的审判。但是，“服从”无法作为无罪辩护的辩词。阿伦特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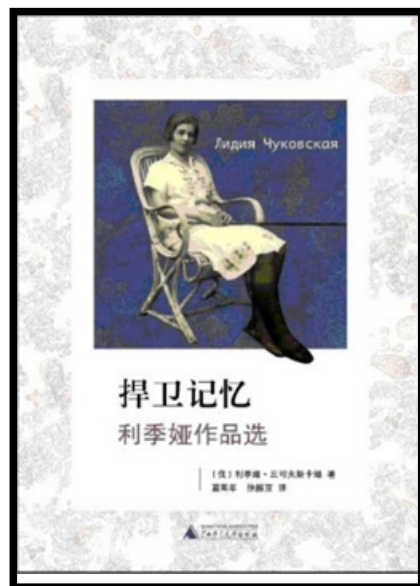
出，向那些参与暴行者提出的问题绝不应该是“你为何服从”，而应该是“你为何支持”，“如果我们能够把‘服从’这个毁灭性的词语从我们的道德和政治思想词汇中剔除，那我们就会受益匪浅……重新获得从前时代被称为人的尊严或光荣的东西”。

阿伦特反对滥用“集体责任”的说法，她认为这是一种虚假感伤，“那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

为有罪的人开脱罪行，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骨头里面挑鸡蛋”。俄罗斯作家利季娅回忆，60年代中期报上直接或间接地肯定斯大林的地方越来越多，对此诗人阿赫玛托娃评论道，“这就像，承认他是吃人的恶魔，但口琴吹得好。”

利季娅曾被开除出苏联作协。黑暗时代，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首先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写得更好，而是怎么写得更安全。发表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只有删改才能发表的情况下，是否接受删改。接受删改，无论如何，毕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利季娅也曾经这样计算。“从效果上计算是正确的”，但利季娅接着产生疑问，“但从道德上计算呢？我怀疑是否正确。”她开始越来越无法接受那些删改，后来她的文章被禁止发表，著作被禁止出版。这样很好，就不用思考是否接受删改的问题了。

《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不仅收入了她的《被作协开除记》，还收入了这位女作家对萨哈罗夫等的回忆，以及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的日记，这也是苏联时期的“燃灯者”名单。有些遗憾的是，利季娅的文论未能收入，比如书中提到的《不是处决，而是思想，而是言论》。

“燃灯者”并不总是遥远的。张立宪主持修复的《共和国教科书》（新星出版社，2011年9月）就是一盏触手可及的灯火。民国教科书，这两三年一时纸贵，但是我对时下评价很高的《开明国语课本》一直保留看法。《开明国语课本》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国民政府建立党国体制，这套教材已有党化教育的痕迹，只是痕迹不算触目惊心。

相比之下，我更偏爱民国初年的《共和

国教科书·新修身》，那是公民教育读本，可惜此前只能在网上读到只言片语。虽然很多出版社加入翻印民国教科书行列，却聚焦于国文科目，而且常有改动。看到张立宪主持修复的《共和国教科书》，有叹为观止之感，不仅收入了“新国文”和“新修身”，还将“教科书”和“教授法”一网打尽，同时还收入了一册《公民须知》，可谓竭泽而渔。整套书按照当年的版式制成线状书，缺点是太过完美，以至于不忍触摸，唯恐污损。如果条件许可，似乎可以买两套，一套“远观”，一套“亵玩”。



重读《我在故宫看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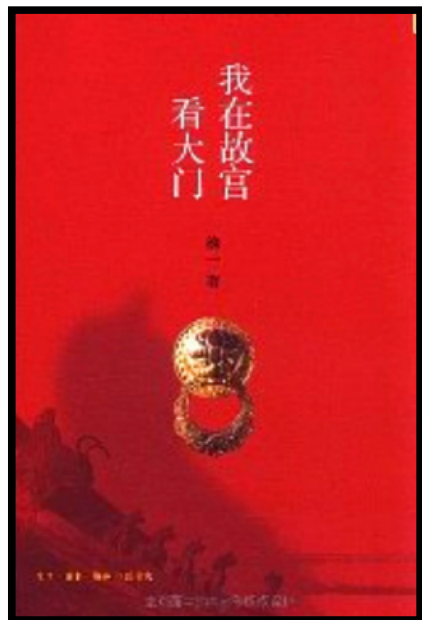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 （广州，peessoa1935@gmail.com）

8月19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回应“十重门”（作为未来的“史料”，不妨录存于此：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哥窑门、瞒报门、屏风门、封口门、拍卖门、古籍门、逃税门），承认故宫管理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和漏洞，向公众致歉云云。忽然想到了一本“相关读物”，维一的《我在故宫看大门》。初读正是故宫“失窃门”时期，现在发展到十门之多，让人想重读，虽然早晓得作者并非故宫看门的老头，肚子里一堆陈年账，但此书写到的一系列故事，与现在又多少有些关系。

就拿“看大门”来说。作者作为知青回城后，在故宫“锡庆门行走”（王世襄先生所封的“顶戴花翎”），包括《我在故宫看大门》和《再忆“锡庆门行走”》两篇，尤其值得一读。前一篇谈及七十年代末期故宫的安保情况，比如警卫队的换班制度、待遇、“同袍”掌故，都有丰富的

故事情节，可读性强又让人信服。后一篇虽是纪念故交王世襄先生，却写到了一场盗宝的虚惊。1949年之后的五起故宫盗宝案，作者“兼差”那会，其实一桩也未遇到，遇到的是报警器失灵引起的骚动，下笔活灵活现，读来让人如临其境（见P123-125）。还有两三次也不是贼人，而是给黄鼠狼闹的。



在少年时代就是无线电爱好者的维一看来,当时故宫警卫队的报警器“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声音探测器”,后来更换了更高级的探测装置之后,1980年和1987年的三起盗宝案都成功擒获盗贼。警犬配置也甚有趣,说是当年故宫添置了两只德国种警犬,没有条件给狗买肉吃,于是警犬就变成了家犬,作者发的议论也很有趣:“由此我又想到,南橘北枳的道理于犬如此,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由犬想到人,由故宫里的犬想到故宫里的人,再想到在故宫里听到的这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沧桑故事,不免于心有戚戚焉。”

(P131)真不知这大半年来的故宫各种门事故,会给作者怎样的感触?大概沧桑之外,也别有一番“精彩”吧。而我等升斗小民,看不到门里门外的真相,也只有从这些几十年前的掌故里看个热闹,以史为鉴,连蒙带猜,罢了。

“我在故宫看大门”只是这部回忆录式文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本书更多的是关于自己的。作者维一是解放初生于上海的湖南人,在北京长大,后来与阿城是同学,作为知青下乡插队也在云南。这部书是一部个人与家族的历史记忆,从解放初写起,诚然有很多亲历的历史大事,如知青下乡,“文革”、改革开放,很有看头,但就其个人经历,如在故宫看大门,放洋读书,从事学术研究等等,甚至从其母亲处听来的上海生活片断,都非常丰富、生动,细节充满了张力,读来给人无限兴味。因为这些个人记忆,挤不进正史的叙述也。试举一例,刚

刚进到大上海的解放军战士,“把米放在抽水马桶里去淘洗”,又把电风扇当成了“妖风”等等。

这些叙述可以说明,作者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但不是写小说),这次重读,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体现在这些故事中的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是语言,故事好看好玩诚然在各个年代都有,但讲述的方式往往很能体现讲述者的特点。细读这本书,没有口水腔,文字简洁而且通顺,意味深长的地方而不造作,就是作者对语言的自觉,关于这一点,不妨举作者在故宫恰逢毛泽东去世时的写法:

“老高欲言又止的,半天才说:‘毛主席完了。’满屋子的人听罢都呜咽了起来,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想想刚刚读到的故宫警卫队仗义的田队长,“为人很四海”的夜巡老王,对家乡水蜜桃引以为豪的魏小队长,这些同袍在那个年代的活法,就会觉得“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是何其真实又熨贴的一句。可能会有人不嗤一鼻——什么时候“文字通顺”都成优点了?!那么只能说读“时文”太少,时下不通顺的书太常见,能把微博140个字写得明白晓畅的也不常见。一个人的作品如果文字不过关,故事再好,也不会吸引人重读;一个写作者要有起码的语言自觉,才谈得上文体的独特。单从《我在故宫看大门》的文字而论,我不免想到了文中出现过的阿城。有趣的是,正因为此书与故宫沾边,自出版以来,介绍的文字不少,似乎论者反复谈到的还是维一的“故宫看大门”身份。

除了语言,《我在故宫看大门》还有一处值得一说,即是知青一代人的青年人格养成问题。作为返城知青,维一是如何能找到“故宫看大门”这份工作的?往后再一翻,原来“我是以探亲为由从农场脱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的尴尬”。须知当年知青返城的两个必备条件是“病退”或者“困退”,而作者居然就办到了,不仅回到了北京,还找到了借住的地方,并且“一直坚守到一九七六年将户籍转回到北京”。从我们对知青返城的了解,近三十年来的文艺作品对这一块的描写,似乎都没有人有如此捷径,而多是烦不胜烦、费尽心力,夹杂了无数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这样一看,是不是觉得作者堪称神通广大了?如果以此为线索,则类似神通的事还不少,抄家时灵活地揭下造反派的封条,取出存折救了母子俩的命(P24),还有知青下乡前扒车去东北的经历,不仅走了许多地方,过检票口的机智也让人叹为观止(P81),后来扒车队伍一度壮大到十四人之多。而这样的游荡,是出于“考察”的目的——看看哪里适合插队——“我们的北京户口一直都没有动,因为还不死心,总想再找到更好的地方去落草”(P82)。这些“时势造英雄”的经历是自我神话的段子吗?但我宁愿相信,这是那代人的故事中奇特的一个——是我们之前接收到的知青一代的故事太单一了,而无论作者所讲的在那个故事在那个年代是少有还是常见,都给这段历史提供了多样性。(像《派克金笔》、《“安能吾得”——兼忆京城的“委托

行”》等篇,其实也写出了“文革”这个非常时期里平民的正常生活。)像扒车这样的经历(还有大串联与下乡),暂且不论其历史作用,是不是也给了这一代年轻人某种程度上的“壮游”历练呢?

《我不怪门合同志》一文讲的是作者“落草”云南之后,有一次学习英雄门合同志,作者因为讲了怪话,很可能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情况下,“我只有放手一搏,杀开一条血路才行”,立即找证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拿到证人的证明之后,作者没有万事大吉,而是拿着证明去找连队指导员,要求将其档案中的不实之词销毁。当晚,他力求连队指导员一起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到达营部,看到后者将档案袋里的材料取出,拿出打火机点燃。今天读来,似乎只会看到其中的执着,但仔细一想,这背后的捕风捉影人心叵测是何等残酷的故事背景啊。如何看待经历了“文革”打砸抢、丰富的阶级斗争的一代人,亦是今天的一个话题(刘再复谈话录《走向人生深处》也谈到这个话题),而维一这一条“史料”,则是重要的“人证”也。

经历了这样的洗礼,是否就“故宫看大门”、参加高考、读书留洋、写文章?并不尽然。书中有一部分是专门怀人的,回忆的不乏大家,比如前面提到的文物专家王世襄,还有考古学家张光直(《忆光直先生》)、前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风雨如晦忆故人——我所知道的俞伟超先生》)、党的高级知识分子高望之(《望之先生二三事》)等人,大抵都是回城之后,

因为不同的机缘得以结交并在学术上受到影响的人物。我唯独对《忆冯爷》一篇深感兴趣。这位冯爷虽然学问深厚，但与前述各位大家比起来，却不是“体制”内的人，而且在那个年代，尤其有点loser的感觉，又有点不可救药的臭老九脾气，因此作者的叙述中，总是能感觉到无所顾忌自由自在的放言（比如：他还说，当初要不是走得快，肯定也做了王羲之），而作者也没有面对大家的拘束，很有忘年交的活泼。作者跟冯爷学德文，但我以为影响并不仅在这类“学业”上：

“另有一回，街上大批判闹得正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他忽然跟我说起美国的文人爱默生和梭罗。他说，只有在那

个悠闲的时代，住在康廓镇那样恬静的地方，过着那样散淡的人生，才有可能产生出像他们那样的文人。他建议我以后如果有机会到了北美，可以去看看那里的环境，非如此不能明白他说的道理。”

（P248）

像这样的话也并不仅仅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有识见和效果。冯爷，甚至还包括后面写到的樊洋人，他们是在那个不甚重视文化的年代里，以自己对文化对学术的热爱影响了这位年轻人。这种言传身教的力量，其实也是《燃灯者》想说明的，只是赵越胜将这种力量全放在了周辅成一个人的身上，写透了。当然这是另外一部书的内容了，就此打住。🔴

一位持不同意见者的“西行漫记”



特约撰稿人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宪法不是挡箭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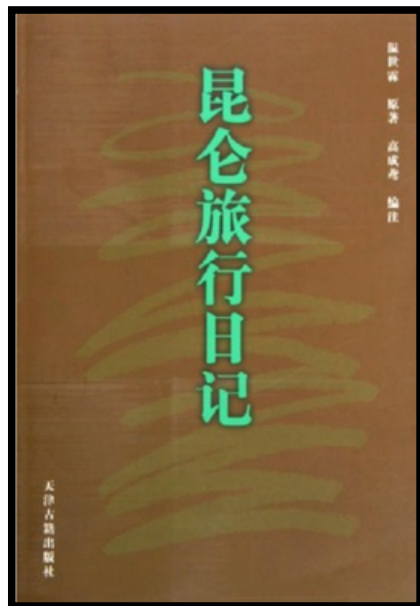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个傍晚。

宣统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时许，天津士绅温世霖正在寓所内晚餐，突然有两三名警官闯入，将其传唤至警察局。三天后，温世霖因为领衔“散步”、主张即开国会，被“遣戍新疆，严加管束”。当时还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曾积极参与“散步”，后来在母校十八周年纪念日时回忆过这段历史。温世霖对学生的激烈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义不容辞地参与了此次运动，以致被视为“黑手”。

从传唤到遣戍的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法治可言。温世霖事发于领衔向政府请愿并担任请愿同志会会长，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已于1908年颁布，附录“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

均准其自由”，同时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但宪法不是挡箭牌，因为正文“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部《钦定宪法大纲》，正文是“君上大权”，附录是“臣民权利义务”。“钦



定”、“君上”、“臣民”，无不说明这部宪法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相去甚远，仅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宪法从无到有。但颁布宪法，不等于实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没有成为民权抵御君权的挡箭牌，反而成了君权挥向民权的杀威棒。

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忆》里回忆，天津无赖某君，混入学界，“挟众罢学，通电全国，几至激成巨变，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电奏发往新疆安置”。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与其说温世霖被逮捕，不如说被绑架。虽然天津政治运动受到影响，但庆幸的是，温世霖虽然被绑架，却没有被失踪，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社会各界进行营救活动，并未因此被视为同案犯而被牵连。

《昆仑旅行日记》是温世霖写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记，记载了他一路发配的“西行漫记”。我在打折书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近代以降的日记和书信情有独钟。这段历史多以宏大叙事为主，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但越是完整，越是清晰，越让人怀疑它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尽管日记和书信常以自我为中心，但好处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见，并不宣称自己是客观公正的。

此前对温世霖一无所知。读过书中附录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与创建南开的张伯苓、严范孙是世交。天津有两个温氏教育世家，一为温世霖家

族，一为温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创办普育女子学堂，后者于1930年创办第二所普育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堂被视为“北方女学先河”，温世霖母亲是第一任校长，1923年去世，孙中山誉为“民国贤母”。与温世霖相比，温瀛士算是晚辈。1945年，两个温家殊途同归：温瀛士弟媳任老普育校长，此时新普育已改名，温瀛士与儿子温刚同去老普育任教。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他的祖父即温瀛士，父亲即温刚。

为国家而纳妾

今人对流放的印象，大都来自《水浒传》。林冲被发配，一路机关重重，如果不是鲁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杀”。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对林冲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后来卢俊义被发配，董超、薛霸再次联袂登场，故技重施，被燕青结果了事，也算是替林冲报仇雪恨了。温世霖比林冲、卢俊义要幸运许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温暖，一路鞍前马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董超、薛霸陪伴林冲从开封走到沧州，清朝的制度与之不同，温世霖一路途径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每至一地更换文武两名解委。

最初的两名解委因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觉理亏，“言语支吾”，而且

因为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与温世霖建立了“鱼水情”。温世霖对河南两位解委的评价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临别时他们“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读至此处，几乎要联想起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后来温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话别时，就引用了江淹的这句名言，称“当时之情景似之”。陕西两位解委与温世霖途径临潼县，三人在夜晚同去华清池沐浴，温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时适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来岳母手做黄河鲤、蟹黄等菜肴。

甘肃解委李子珠尤为独特，温世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极开通，颇有肝胆，与余一见如故”。此说绝非客套。李子珠听说温世霖案发缘由，极为打抱不平，建议温世霖家人上访，温世霖感慨：

“李君古道热肠，令人感激”。到了兰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设宴招待温世霖，并建议其纳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监禁之虞；若携家眷，则可通融，在城内赁屋居住。”李子珠称家中有侍婢两人，可供选择，但被温世霖谢绝。

温世霖遣戍新疆与直隶总督直接相关，甘肃藩司系直隶总督胞叔，李子珠因为与温世霖来往受到牵连，停职三年，解委也换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与温世霖来往，不仅送去翅、参、鸡、鸭

和绍酒，还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愿意失去温世霖这位良友。温世霖非常感动，称：“风尘知己，邂逅订交，不谓齷齪世界中，尚有此肝胆照人，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热泪纵横矣。”从第一印象之“颇有肝胆”到日久见人心之“肝胆相照”，温世霖对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贯之。

后来李子珠再次建议纳妾，要将两位婢女送来以供选择，温世霖再次拒绝。李子珠干脆责之以大义，劝温世霖“应知一身所负之责任极为重大，切宜为国家爱护保全”。众多友人一致决定为温世霖物色人选，在兰州曾谈妥孀妇一名，但因对方不愿远行，作罢。于是，他们集资百金，委托解委在凉州代为觅一佳丽。这位解委与于右任是关中书院同学，“为人颇有风骨”，慨然应允，并称“绝不辱命”，后来果然兑现承诺，在凉州为温世霖觅得一位女子。今天看来，纳妾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为国家而纳妾”的说法更是言过



图为温世霖小照

其实，但是，这在当时却是一段佳话。

温世霖在兰州停顿时，曾有一位名为陈克义者，声称奉孙逸仙之命对他沿途保护。但温世霖知道绝无危险，不会遇到董超、薛霸，辞谢了远道而来的“鲁智深”。温世霖对一路同行的诸位解委称赞有加，称“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热心维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护”。陪同温世霖到新疆的甘肃解委，甚至产生了调到新疆当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如此“鱼水情”，在“躲猫猫”频发的时代，读来恍然如梦。

偶遇“张麻子”

在温世霖的“西行漫记”中，一路“默加呵护”的不仅有解委，还有地方官员。虽然直隶总督通电沿途各省督抚对温世霖严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兰州这些城市的长官贯彻了这一精神。在绝大多数地方，如同《昆仑旅行日记》的编注者高成鸾先生所说，温世霖“不像囚车里的罪犯而像视察中的长官”。

钦犯温世霖仿佛中央巡视组成员，一路不乏结彩悬灯欢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灵宝，即近年来因为警方跨省抓捕网友而名噪一时的河南灵宝，一名解委大声斥责地方差弁：“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得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权制下，对地方而言，所有“中央”来的、“上头”来的，都具有一定的权威，哪怕钦犯也被视为上

达天听者。更何况，在一个缺乏法治的环境下，钦犯改日成为钦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难之际雪中送炭，将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但很多地方官员对温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资心理，而是有着观念上的认同。在陕西华山，温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陈设雅洁，帘帐被褥均新制，极华丽”，茶水点心，“极其适口”。最让温世霖意外的是，房间里还放有几本新小说，“此等闭塞地方，有此新书，直可谓之奇宝矣”。知县“人极开通，思想新颖”，有两个弟弟在日本留学，本来想与温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场规则，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陕西咸阳，知县与温世霖有同乡之谊，又受朋友之托，虽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属下盛情招待。

也有官员完全不避嫌疑。陕西临潼知县张瑞玘就与温世霖一起“痛说革命家史”，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临行时馈赠十二金，供购御寒皮斗篷之用。温世霖称他“言语爽直，精神奕奕，无丝毫官吏习气，与余一见如故”。这与张瑞玘的思想倾向有关，张瑞玘自陈曾是戊戌党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有会试同年及同乡之谊，亲赴菜市口为杨深秀收尸，并周恤杨深秀之遗孤。如果此段属实，张瑞玘和杨深秀当为忘年交，杨深秀生于1849年，张瑞玘生于1872年，两者相差23岁。晚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的“政审”，以致张瑞玘这种“动乱精英”居然能潜伏下来，做到一县之长，结交各路好汉，颇有些《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风格，只不过张麻子

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年间。

温世霖盛赞张瑞玘：“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两人相见是在1911年1月，十个月后，张瑞玘起事，后曾任国会议员，去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墓表。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瑞玘诗文集》，该书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肃安定县（1914年更名为定西县，后因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闻名），县令系晚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之胞兄，等候温世霖多时未遇，后因公务进省，但嘱属下热情招待，临别前馈赠二十四金，足以购买两件御寒皮斗篷。刘春霖也写信给胞兄，“特嘱从优照应”。在甘肃金县（今榆中县），知县与温世霖好友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听说温世霖途径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预备酒席招待，自己则出境六十里迎接，双方亦是“一见如故”，临别时知县馈赠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员，迎来送往，不可胜数。

海底捞式的待遇

流放途中，温世霖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冲，更像如沐春风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马相见，均是纳头便拜。在西安，陕西按察使因为温世霖宾客盈门，设岗禁止宾客。但来访者直接闯入，川流不息，如入无人之地。更有军官在除夕赶来，遇到岗兵阻拦，手持马鞭鞭打他们，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温世霖馈赠川资，让人

联想起黑旋风李逵或霹雳火秦明。

温世霖一路享受贵宾待遇，据当时天津长芦盐务系统派驻洛阳人员的一封家书显示，温世霖“并无刑具，十分优待”，甚至有“饭后手巾把、漱口盂、茶点、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捞”方能享受——所以，写信者感慨：“吾国此次对待犯人这等优异，为从来所未有。”如前所述，除了在西安、兰州等地，温世霖发送电报、访客会友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仿佛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即使禁令也往往形同虚设，电报自有朋友代发，访客也常常横冲直入。

最受打击的一次是在兰州，温世霖听说甘肃按察使“颇有气节”，于是登门拜访，对方拒不相见，并告诫“不准犯人温某随意出门，随意禀见”。温世霖称：

“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耻大辱。当时闻之愤火中烧，几至晕绝。”但后来，他听说甘肃按察使此举亦是慑于甘肃藩司，情绪稍有缓和。

除此之外，温世霖也曾经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风，下榻之处积水和马粪混杂，“湿臭之气，触笔欲呕”，夜间更是“冷风彻骨，遍身战栗”。这对世家出身的温世霖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他感慨“苦痛万状，非言可喻，真可谓人间地狱矣”。可是，如果温世霖知道几十年后在自己途经的地方，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夹边沟，就会知道他所谓的“奇耻大辱”、“人间地狱”都是小儿科，不足为外人道也。

与高尔泰、杨显惠笔下夹边沟的“人祸”不同，温世霖在“西行漫记”中遇到的问题大都是“天灾”。比如他称之为“人间地狱”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条件如此艰苦，并非专政机关有意为之。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世霖的待遇甚至超过解委和地方官员。

从直隶到洛阳，温世霖乘火车，此后没有铁路，但也不是像林冲一样步行，而是乘车。从兰州出发时，温世霖的车“宽如一小屋，可容五六人坐而聚餐”，需要梯子才能上下，出了嘉峪关后晚上就住在车上。如果有好事者，可以据此论证“房车”发源于中国。温世霖独自享受专车，两名解委只能共用一辆，与其说他们是解委，不如说更像随行的跟班。

至于饮食，更不必说，地方官员大都盛情款待，几乎一路尝遍各种风味的“农家乐”，温世霖一行也自备了各种食物。在西安，同乡赠送橘柚、鲍鱼、茶叶等物，并有朋友招待以韭黄猪肉饺，“极美，不减家乡风味也”。在陕西乾州，温世霖和解委饭后煮食酒酿，加上蛋清、白糖，“味甚纯美”。在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马哨官馈赠鹿腿和鹿筋，“异味初尝，非常甘美”。在甘肃安定县，马哨官馈赠羊羔一只，他们又购买肥鸡两只，但身边没有调料，只加盐烹煮。温世霖一边感慨“滋味之香美，异于寻常”，一边又觉得不太满足，不过是“饥者易为食”，因为饥饿，所以觉得好吃。

在兰州，因为随后的路途人间稀少，需要自带食物。友人除了为温世霖准备

了白米、小米、白面和鸡蛋等必需品，还准备了“腌肉、咸鱼、腊肠、火腿、洋酒、海参、熏鸡、卤鸭、咸菜等物，可谓应有尽有，周到之至”。以至于温世霖感慨，当年柳宗元、韩愈、苏轼贬谪边陲，也未曾享受如此待遇，因而“愧对前贤、扪心增疚”。离开兰州时，友人又送来“一品锅”，为其饯行。没过多久，温世霖又在新疆哈密再次吃到军官赠送的“一品锅”，也有官员在宴席上准备鲫鱼，这在缺水的西北地区堪称珍品，“鲜美异常”。哈密王也视温世霖为上宾，隆重招待。

不仅食不厌精，对于饮水，温世霖也很在意。过了西安，温世霖感慨一路没有清泉可饮，泡茶也没有味道，即使货铺出售的瓶装京茶也只是粗茶。在刘春霖胞兄担任县令的甘肃安宁，水质咸涩，县署专门送来“特供饮水”，该水只有一缸，供县令及夫人专用，取水需两日往返。饭后，温世霖一行先食用梨橘，但是不觉解渴，于是煮水分饮，虽“倍觉甘美”，但温世霖认为是“渴者易为饮”，因为干渴，所以觉得好喝。后来他们途经名为盐水河的地方，煮茶，加上梨枣调味，依然难以下咽。尽管他们抱怨水质，店主却跪求他们口下留水，因为水极为稀缺。于是，温世霖一行用川橘和冻梨解渴。

流窜饭醉

嘉庆年间，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诗饮酒皆被封杀，只有出嘉峪关之后，才偶有动笔，但不谈国是，只谈山

水。不可思议的是，温世霖是政治犯，却一路政治活动不断，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联，“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同乡之谊者，津商曾经随左宗棠入疆，在西北颇有影响，如果以“大同乡”而论，范围更是大至五省；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志同道合者，立宪虽然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却已在士绅阶层具有一定共识。在“西行漫记”中，温世霖和天津商会、天津咨议局保持联系。

温世霖流放之初，途经直隶保定，车站居然聚集两千余学生，准备把他劫下，火车没有在保定停留，直接驶过。到了河南开封，河南咨议局议员和学生聚集于车站，加以挽留，反而是温世霖当众演说，

劝他们放行，众人集资八百余元，供温世霖沿途开销。此后，一路为温世霖提供川资者，不胜枚举，以至有集资纳妾一事。

这位钦犯简直是一个流窜饭醉分子：一边写信给朋友，主张“立宪应从速筹备”，同时一路会见旧雨新知，商讨立宪大业。他抵达西安后，得知直隶咨议局已经致电陕西咨议局，请求予以照顾。温世霖还在西安与几位同乡兼同志“纵谈国是，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一个钦定的政治犯，在流放途中，考察立宪，会见各路反对派，商讨如何起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尤其到新疆境内，天高皇帝远，温世霖不仅私下交流，更是获得公共言说的空间。在新疆奇台县的三天，温世霖发表三



图为温世霖作为国会议员留影

次演说。他到实业小学参观，教员率学生六十余人开欢迎会，请他做演说，“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温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国图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在以商人为主的直隶同乡会、陕省同乡会上，温世霖就商战展开演讲，主张商会互相联络，同时还就主张“讲求自治，凡属公民选举权，万勿轻易放弃”。在新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县），群众围观没有发辫的温世霖，温世霖借机与他们交流，消除了他们对学堂的误会。温世霖感慨：“惜无人为之言说，以开通民智耳。”

林冲到了沧州，须吃一百杀威棒，行贿之后，才称病躲过。温世霖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却主动前来探望，并送来酒席。温世霖请示如何“管束”，知府让其休息数日，同时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新疆臬宪杨增新也表示：“既已到此，即无事了！”

在迪化期间，温世霖几乎疲于奔命于饭醉活动，“宾朋之来欢迎者，踵趾相接”。杨柳青商帮领袖、日本归来留学生、各路官员纷至沓来，有送鱼翅席者。当地甚至传有一句俗谚：“请温七爷吃饭请得起，请温七爷喝酒请不起。”因为新疆交通不便，“外国酒极贵，啤酒每瓶银二两，香槟酒大瓶者每瓶十四两”，每次宴请温世霖，洋酒需要三四十金。

朋友为温世霖选择的新居更是胜过江南园林：“房外回廊环绕，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桥通焉。窗对博克达山，山头终年积雪，每风雨晦明，云影山光，时时变幻，快人胸臆。可以修养，可

以读书，虽终老于此，亦云幸矣。”此外，还有凉州女子作伴，红袖添香。

在《昆仑旅行日记》的最后，温世霖写道：“从此闭户，埋头读书养气，静以待时而已。”

维稳的悖论

在流窜饭醉途中，温世霖至少两次与朋友预测时局转折的日期。一次在西安，一位北洋大学毕业、担任陕西高等学堂英文教习的同乡表示：“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大约大驾行抵新疆，即可返轡。”一次在兰州，甘肃解委李子珠被停职，温世霖称：“预计三年以后，吾侪必能扬眉吐气。”

一个健在了267年的老大帝国，会在半年至三年之内轰然倒塌？他们似乎太乐观了。但结果如今已经众所周知，不到一年的时间，武昌首义，不久温世霖返回天津。

帝国的统治，通常依靠暴力消灭反对派，通过腐败收买体制内。但温世霖的经历，说明这种维稳模式是难以打开的死结，将面对双重悖论：一是政治悖论，暴力的效用日渐递减甚至适得其反，“钦犯”成为英雄；二是经济悖论，腐败如吸毒一发而不可收，维稳开支入不敷出。两者决定了维稳的不可持续性。

暴力唤起的恐惧比暴力本身更有威力，所以帝国从不掩饰它的暴力，而是通过展览暴力来制造恐惧。但是在晚清，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

众对反对派的尊重。温世霖被发配新疆，一路不是道路以目，而是觥筹交错，无论体制内外，几乎都对他表示敬意。这种现象绝非孤例，日知会会员胡瑛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狱中的胡瑛仿佛流放中的温世霖。范福潮先生在《“精神领袖”胡瑛》（《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里讲述顾过这段历史：胡瑛在监狱中会见各路朋友，饮酒聊天，商量党务，还与狱卒的女儿谈情说爱；关押在其他监狱的同案犯也大同小异，监狱如同“俱乐部”，同道纷至沓来，甚至狱卒倒茶送水，不但经济无忧，还可以接济困难学生，“若遇同志商谈重要事务，并可于夜间私自出狱”。

或许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专政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帝国才会崩溃。但是，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辛亥革命仿佛“光荣革命”，清帝能够和平逊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清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清室对反对派的优容。

与公开的暴力不同，腐败是帝国的机密。帝国通过反腐与腐败划清界限，公众对此并不陌生，但这隐藏了一个秘密，即腐败与反腐都是治理术的一部分。对腐败，帝国保持默许并进行制度性鼓励。通过这种持续收买，体制内像吸毒一样对帝国保持忠诚，收买的成本却由公众来支付。而反腐则是随时祭起的利器，帝国对体制内的潜在反叛者进行选择性的惩罚，同时又制造了反腐的形象工程，一举两

得。腐败和反腐像一对健身球，牢牢地攥在帝国的掌心，风生水起。

但是，在制度性鼓励和选择性惩罚之下，腐败之瘾会泛滥无际。公众虽然对帝国的治理秘密缺乏认知，但是他们需要支付腐败的成本，这是无需思考就能感知的负担。河南解委在灵宝借用温世霖“钦犯”的名头，斥责地方差弁，是为了向县官索贿，形成惯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须按照这个标准行事。事后这名解委要给温世霖白银二两四钱、洋烛一包、茶叶一包作为感谢，温世霖坚辞，感慨：“吏治如此，焉得不亡？”通过流放经历，温世霖发现“所有过往差事，名为由地方官供应，实则征收民间物品、车辆”，此外还要中饱私囊，以钦犯过境为例，如开支为大钱二三十串，地方官要向民间索取二三百串，有十倍之多。

温世霖一路享受的海底捞式的待遇，以地方官吏对民间的数倍盘剥为代价。甘肃安西州官因为无钱供应温世霖一行，以至于“避不敢见”，被温世霖称为“一大笑话”。新疆哈密每年需要像岭南进贡荔枝一样，给西太后进贡哈密瓜，可谓“一骑红尘太后笑，无人知是西瓜来”；每三年还需大贡一次，除了西瓜、骏马等贡品，还需准备赏银五千两以供贿赂。哈密王的女婿因为疲于应对官员的征收，“忧劳致疾，成精神病，医治罔效”。

“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温世霖这样写道。这不是一家之

见，陕西“张麻子”临潼知县张瑞玑甚至比他还激进。这位潜伏的戊戌党人，本来想走体制内路线，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识到此路不通。在《红楼梦》里，柳湘莲说宁国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陕西“张麻子”则称：“（县衙上下）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

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在与温世霖的畅谈中，张瑞玑多次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

维稳本身就是饮鸩止渴，当体制内外、官民上下都觉得非变化不可时，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只是新疆迪化的“豪华无敌山景房”，温世霖没有享受太多时日就离开了，今日看来尤为可惜。Q



“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续)

——高华访谈

特约撰稿人 灵子 (北京, liufang0815@gmail.com)

高华对革命话语叙述的兴趣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垂髫之时。

他清楚地记得,1963年8月某日,他看到《新华日报》上有大字号标题“赫鲁晓夫拥抱哈里曼”。哈里曼是当时美国派往莫斯科签署苏美英三国禁止部分核试验条约的特使,按照一般的报道方法,标题大致应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接见美国特使哈里曼”,可是中国的报道特别强调“拥抱”,他联想到课堂上老师说,世界革命的中心已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显然报上用的“拥抱”是暗指苏联勾结美帝国主义。那时他才9岁。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读毛选、《苏共二十大文件集》《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基础》等,一早就知道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是所谓“匪帮”,也从《列宁主义基础教学参考资料》上读到莫洛托夫就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发表的广播演说《告苏联人民书》,还读了所有能找到的俄苏文学。“那时就感觉到,虽然中国的报纸天天在骂苏修,但是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政治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而以后形成对苏联历史的审视态度,





则是看了三本意义非凡的书。《赫鲁晓夫回忆录》、锡兰共产党员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晓夫主义》，以及《第三帝国的兴亡》，尤其后者揭露出的斯大林与法西斯的勾结，令高华极度震惊。此外，他还读到一篇长文，是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在1964年2月在讨论中国问题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上的一个反毛报告，对此前毛在高华心中的神圣地位大有冲击。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少年怀揣着巨大的秘密，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投入更多的阅读。他从不与家人分享自己的想法，父亲因建国

前参加地下党而被划为“右派”。六、七十年代一家人吃了无数苦头，母亲从来教育孩子谨言慎行，一再告诫子女“祸从口出”。

一方面是对历史、政治的敏感天赋，一方面家庭给予的谨言慎行的教诲，高华在毕生的历史研究中无不显示出这两方面特点。学者萧功秦曾评价高华：“他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来。”他又有严格的尺度和律己精神，约束自己的主观性，讲究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也因此，很少见到他接受媒体采访，若干年里数下来不足十篇。

意识形态的国家化

1949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是怎么一步一步变为国家意识形态的？

建国之初，中共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上允许包含不同的经济成分，但取缔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政治上实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是经济并没有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保留私有经济，但意识形态一开始就提出来要以马列为指导。所以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虽然政治上有民主党派，有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参加政治，但是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打碎国民党时期的思想秩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破”和“建”。

“破”的过程，就是严禁国民党党化的相关报刊存在，同时对一些原反蒋亲共或中间派的民间报刊等出版单位，名义上允许，实际上以各种不同方法迫使它自动关闭。比如最近我一个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就是根据原始档案，研究南京在新中国建国前后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她就发现南京当时一些民办报纸，中共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办法，让它办不下去，最后自己宣告关门。

当时全国影响非常大的民办报纸是《文汇报》，在1949年以前的反蒋革命中是配合中共的，建国以后，《文汇报》老板徐铸成——1957年被划为大右派——以为迎来了民间报纸的春天，但他错了。他自己不



能编发任何国际通讯，以及任何独家的政治题材的通讯，必须一切听新华社的，只能转载。在出版自由和采访方面的限制比国民党时期严厉得多。其实上级领导同志已经暗示过他了，不存在民间报纸的发展空间，而是使之完全地服从党的领导。

“建”的方面有很多措施，比如一建国就要修改教科书，请的都是诸如叶圣陶、胡愈之、宋云彬等这样著名的学者，但是思想方面是由中宣部指导的。中共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跟苏俄还不一样——苏俄因为革命来得特别快，不存在一个革命之前的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在延安、苏北革命根据地时期，都有人管教育、管出版，有一套经验，直接拿来用就可以，无非是增加几个新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几篇重要文章，主要是《新民主主义论》，对国统区从事文化教育的人进行初步改造。当时对中小学教师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先接收下来，夏季举行培训班，全部进行集训，就是思想清理，由负责同志来作报告，然后讨论，之后就用这些新概念来教书了。这一套新话语实际上是延安时期的话语，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配合全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胜利的进军，而逐步推广的。推广的过程很顺利，因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既然选择留在这里，就愿意配合。

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新概念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被接受，不像几年之后，中央讲了什么话，底下都完全拥护服从。这

时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质疑，部分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质疑，就是斯大林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对此有些在国统区从事文教工作的人不能接受。特别还有一些信教的老师，不能听人是从猴子变来的。第二，“对苏一边倒”，很多人有抵触。第三，阶级斗争。建国初虽然没有立即开始大规模的清理运动，但已有所触动。有些知识分子就觉得是不是动作太快啊，很多人还是很好啊，一时误入歧途啊，是不是可以以德报怨啊等等，以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对抗当时正在开始的社会改造。这个过程大概是从1949到1950年。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配合而来的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针对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对美国的好感，开始系统批判美国、颂扬苏联，这实际是把苏联在1947-1948年搞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搬到中国来了。它具体在文化、思想、科技、历史领域的表现，就是提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发明都是俄罗斯人干的，美国那些科技发明都是假的。中国就把这个思想引进来了。当然，中美在朝鲜开战，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五十年代初苏联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以后驻中国的大使尤金博士，当时由斯大林派到中国为毛选的俄文版翻译做顾问的，他在中国全国作巡回演讲，得到毛的大力支持，一路上都由各级党政领导陪同。他在南京做过报



告,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美国没文化,苏联有文化。但是当时中国著名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留学英美的一一这跟苏联不同,苏联跟西方的联系已经切断几十年了,最多是苏联自产的博士一一中国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理工类知识分子听到这个内容很多人都很吃惊,而且很不以为然,于是又针对这些人进行教育,最后使他们认同“美国没文化”的新概念。

这些都伴随着几个事实,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的胜利,这是巨大的现实存在;二是它占据了几个制高点,我前面提到的,统一中国、结束内乱和关注底层,这一下让知识分子觉得共产党可能是更进步的,他们承认自己错了。这是建国以后革命话语建构的方式,伴随批判和政治运动,新话语在全国普及。

后期就是通过反右、文革等大规模运动不断强化?

到这个时候,早就不成问题了。成问题的是五十年代初,以后是因为领导同志把这些看得过于敏感。建国初的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1955年,有一个全国性的“向苏联学习”,非常深入,以后刘少奇曾经批评过,说1955年是“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当然,老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想可能与外在的某种压力有关,建国初,社会改造急风暴雨,一些历史上有严重反共问题

的知识分子甚至被枪毙或被抓起来,这对其他人都是一个震慑。当外力稍有缓和,一部分迟疑、质疑又反弹出来。1956年“百花齐放”以后,少数知识分子以为春天来了,又开始质疑,这些质疑实际上是前几年他们在外力压力下噤声的反弹。1957年反右之后,一劳永逸解决了问题,基本上不再有来自知识阶层的质疑了。

这以后变成党内的知识分子,对占主流的、或者今天看起来明显过左的政策提出质疑,这是党内范围。党外,像1958年大跃进这种今天看很荒唐的政策,没有一个老先生质疑,因为乱说话的教训太深刻了。至于他们是不是心悦诚服,这不知道。所以领导者还要继续搞阶级斗争,先叫他们“交心”,经过考验和研究,对知识分子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吸收了一批高知入党,他们算是自己人了。对于那些更大多数的一般知识分子,干脆给他们戴上一个紧骨咒,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这样就把知识分子问题都解决了。

早期知识分子被定性为什么阶层?

既可以为反动阶级服务、又可以为革命阶级服务的中间阶层。这主要是看革命需要。因为建国初,69%的党员是文盲,部队中的一些高干,许多中下级军官、士兵文化程度都非常低,所以建国初有一个吸收年轻知识分子参军的热潮。以后知识分子



参军需要很多政治条件，特别是家庭出身合格才行，但建国初只要家庭不是特别有问题，都可以参军，基本上都是在部队做文化教育工作。甚至有过直系亲属在五十年代初被镇压的，还可在军队继续做文化教员。到了1955—1956年左右，新的自己人被培养起来，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就都被清除出去了。以后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甚至认为，解放前的知识分子是“旧知识分子”，解放后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新知识分子”，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干脆一锅煮，都打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筐子里了。

当年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也算“旧知识分子”吗？

这倒不是，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些人在延安整风时期被批判、被清理，后来也认同了灌输给他们的观念。建国之后，他们都是各地的“接收大员”，比如各地的文化厅长、副厅长、教育厅长、文化局长，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或者党委书记、副书记等等，身份就改变了。原来他们是被批判者，现在把这一切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来一次，是批判别人的批判者。这是延安知识分子的双重性。

改造知识分子

提到知识分子改造，您曾经用“有限革命”“无限革命”加以概括，这两个概念怎么解释？

这两个概念不是我提出的，其他学者也谈过这个说法。按照一般的理解，革命最重要的目标是改变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具体而言，有限革命是拿到政权就行了，革命不进入到最后的思想领域——虽然任何革命必然触及到一定的思想层面。但是无限革命会螺旋式的不断向更高层面发展，比如说，夺取政权以后，还要进行精神和灵魂领域的革命。中国革命领袖搞的就是无限革命。这就是你

提到的革命与人性改造的问题。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大规模的革命，近代意义上的革命就有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等等，但是规模最大、震撼最大的是法国革命、后来的俄国革命，以及再后来的中国革命。这是历史上几次特别大的革命。前面几次，美国革命推翻了殖民主义者，取得了独立，革命也就结束了；英国光荣革命使各方互相妥协，大家也觉得可以了，可以相安无事了，有问题以后再逐步改善。但法国革命不一样，它进入到“锻造新人”的阶段。所以英国革命很少见到创造了什么特有的词汇，但法国革命有，比如“公民”这个词，它已经进入到价



值观和生活方式层面。

俄国革命也是具有创造性的，这场革命具有一种“救世情怀”，你去看金雁的书，分析得很透彻。三十年代以后，俄国革命进入文化革命阶段。过去我们对这场苏联文化革命的理解，就是剧院增加多少、图书馆增加多少、人民识字率增加多少，事实上这种认识是有偏狭的。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文化曾经一度出现多元的局面，音乐、电影、美术、文学领域都有体现，但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初期就已经被“党文化”给平面化了。到了1934年，斯大林在他人的帮助下，创造了一个新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艺领域实现了一统天下，实现斯大林主义的绝对主导地位。

但是这个过程很长，十月革命是1917年，（当然等全俄平定下来是1920年，）到1934差不多有十几年，文化革命才开始。这跟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积淀深厚和领导人对俄罗斯文化某种程度上的喜爱有关。俄国革命毕竟是城市革命，比如一些高级领导人喜欢看戏剧、看歌剧，跟纯粹的农民不一样，品味相对高雅。最近有一本书叫做《驯服的艺术》，是前苏联一个音乐家写的，书里提到，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克格勃（当时叫“格伯乌”）的高层，热爱歌剧。其他人每天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但是莫斯科有几家剧院里的人就能享受到最尊贵的生活，不受影响，因为他们能提供原汁原味的高层们喜爱的艺术。我的意思是还有人喜欢这个。我们对比一下，



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革命的主战场在农村，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前的1942年就提出了“文艺为革命服务”的要求，而他们是在胜利之后的1934年才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这以后就顺理成章出现了一个新概念，“苏维埃人”，就是“新人”。这种“新人”的要求是，全新的思想，无限忠于领袖，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自己的父亲母亲很可能就是敌人，要大义灭亲。前苏联在1932年树立了一个不到13岁的少年儿童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作为全国学习的英雄模范，到处都有他的塑像。他的事迹就是向苏联政治保卫局（即以后的克格勃）揭发了他身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如何同情富农，还说反动话等等，其父随即被抓，据苏联官方说，莫罗佐夫在



森林中被其祖父和堂兄杀害了，然后政府处决了他的祖父、祖母等四人，然后号召全国向他学习：“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这就是典型的“苏维埃人”，学习他的浪潮到八十年代才慢慢下去。我的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就是考察中国的英模制度，其中写到中国的英模制度一部分来自于苏联，就专门写到了莫罗佐夫的个案。

所以，要培养新型的人，而不仅是一种新的制度。1958年，陈伯达奉毛泽东之命去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河南的嵯峨山一带考察，他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叫《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就是改造人性。这种人性之改造就是无限革命，不断改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以至于最后就是自我的全部否定，心中除了伟大领袖和伟大领袖的教导之外别无杂念，这就达到了“心里光亮亮”的境界。

为什么知识分子都能接受这个？

在中国做这些事情比较容易，因为它有几个来源。五四之前，中国就有一种思想，“改造国民性”。大家觉得我们的国民性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梁启超、鲁迅就有这种思想。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毛泽东的“改造思想”，这个过渡并不困难。再加上以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又和这个契合起来，很多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为什么能接受自我改造？

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生长在这个环境下，感到外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痛彻心扉。许倬云先生就跟我讲“忘不了抗战那一段”，回忆那时候自己身体不好，让农民挑着，旁边就走着毛驴，一路往西南逃难的艰辛。你看齐邦媛的《巨流河》，也看得出来抗战对那一代人的影响有多深。到了1949年共产党结束内战，虽然许多知识分子对“对苏一边倒”有看法，但是基本上认同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局面。他们思想内部有了这种变化，就像费孝通说的，“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都有民粹倾向，就像鲁迅五四之后写的《一件小事》，坐了黄包车，为自己感到惭愧，心里同情穷人。类似的故事有很多，能否具体帮助穷人，不知道，但是对底层人民的困苦是有感觉的。当时知识分子觉得共产党是代表穷人的党，使穷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很多人转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这就打开了思想改造的大门。

共产党主要是靠事实——结束内战、统一中国，以及穷人地位改善——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对社会建设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于是开始接受共产党的若干新解释。再加上诸如周总理这样的人现身说法，有一次他给知识分子作大报告讲了五个小时。连周恩来这样的人都要思想改造，那他们能不改造吗？



这种斗争的实际作用如何呢？比如您讲整风运动，认为从党的利益考虑，对后期夺取国家政权大有帮助。

它首先是对党起作用，把党变成一个高度战斗性、纪律性的严密组织。另外，它提供了一个以后整合社会、特别是整合人的思想的基本方法。简而概之，它最关键的是，锻造了兼具战斗性和忠诚为一体的革命者，这就是一方面无限忠于领袖，听组织的话；另一方面，又站稳阶级立场，对敌斗争勇敢，敢于冲破旧中国传统伦理秩序，例如，对地主老爹老妈划清界限，做大义灭亲的革命先锋。

当然，有时也有很多很现实的因素，不单纯是为了主义和理论，很多时候也是出自权力、利益的考虑。赫鲁晓夫搞掉贝利亚，说他违背斯大林的思想，是英国特务，就纯粹是瞎扯。其实贝利亚是斯大林死后最早提出改革口号的人，他最先提议释放劳改营无辜被关押者，赫鲁晓夫联合其他元老搞掉他，是因为贝利亚手中集中太多的权力，对领导层的多数人构成巨大的威胁。国民党也有权力、利益争斗，但是它还想不到打理论的旗号，说什么李宗仁、白崇禧、孙立人等歪曲了三民主义啊、反党、反总裁的思想啊之类。在那个结构下，就是打理论的招牌，也没用。而共产党非常重视“思想正确”，我们的领袖特别强调师出有名，什么事情都要先搞一个概念，他也具有创造概念的巨大能力。这次是右倾、下次是

左倾，再下次是“小脚女人”、“形左实右”、“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者”、“黑帮”、“走资派”、“犯了走资派错误”、“右倾翻案风”、“投降派”等等……永远有概念。当然这也有解释啊，诸如：“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从此“阶级斗争”就可给任何斗争找到合理性的解释了。

即便从执政者角度，如此高度一致的思想文化状态，真的是正面作用更大吗？不是太缺乏活力吗？

这要从什么角度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乐在其中啊，只是“思不出其位”，听领袖的话，这永远是根本，而且也可以根据新的状况不断进行调整啊。再则，我认为他们不会像你这样想问题的，他们觉得这是很成功的一个方面。同时，他们也是极其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主观上也希望把事情搞好，如果当事情走向完全的绝对化，也知道要回头，比如到了文革后期，老百姓已对无尽头的“斗争”产生了厌倦，就提出“安定团结”的口号，甚至还提出“可教育好子女”的概念。当然转折点是1971年林彪事件，如果不是这个，还能维持很久。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包括创造词语以及有使其社会化的权力，真的是可以挥洒自如了，就达到领袖诗词里面讲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理想境界了。



革命叙述的延续

毛泽东对话语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吗？

是的。从延安时期，毛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1967年4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她是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巡逻兵。他们高度敏感，一首诗、一本小说、一部戏剧，一首寓言，都能从政治的角度嗅出某种东西。这个特点并不是六十年代初突然产生的，其实早在建国前就是如此。包括那个时期他提拔了一批受他信任的人从事这方面工作，比如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他们一般被认为是共产党中间有文化，有学问的人士。陆定一从1945年做中宣部部长，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下台，做了二十年，时间不谓不长。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他们都是意识形态学专家。他们手下还有一批人，既是官员，也是专家。

毛还自己写通讯，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建国以后，有关胡风、反右的几篇社论，也都是他写的。文革中不断传来最高指示，什么“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吐故纳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等等，讲得很通俗易懂。一直到自己不能动的时候，毛都亲自看社论、加批语、定调子。

有时候也有前后调子截然相反的。比如建国初期有一个朗朗上口的概念：“对苏一边倒”，强调中苏友好。在历史上，中国人对俄国多抱有怀疑和警惕，主要是受俄国人欺负太深，但他就用这个词，那时党

的威信那么高，各级党组织又强力推广，甚至自上而下建立一个新的实体组织“中苏友好协会”开展大规模的推广和宣传，居然改变了中国人的想法。两三年以后，这个口号又不提了。但谁又会去问他，为什么不讲“一边倒”了？再比如讲南斯拉夫，先说“铁托是修正主义”，后来在1974、1975年左右，又是他说，“铁托是一块铁”，也不做解释。因为他知道，没有人敢跟他质疑，其他宣传再跟上，时间过去也就过去了。

后来毛有所改变，他有两个理论班子，一个是老一点的，像陈伯达等人，另一个是张春桥、姚文元等，可能毛认为陈伯达后来的理论创新能力弱了点，他更欣赏张、姚。他还有一种新倾向，就是选一些“老粗”来管理这个工作。虽然中央一级是由张春桥他们定调子，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但是很多次一级的高级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开始选用没有文化的人，他们只要负责传达就可以了。比如毛经常说：“丘八管秀才。”因为他对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不满意，觉得这些人跟不上自己的思想，反而更欣赏那些文化不高、工农出身的同志，只要能领会、跟着做就行了。他之所以欣赏张春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张能严格地在他的框架下有所创新，很聪明地总结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再加上张春桥办事能力也很强，这肯定就是“难得的人才”了。



除了词语之外，图像也是革命话语叙述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吧？

对。我曾就艺术家张大力的“第二历史”的展览（可参考《独立阅读》2011年6月号文章《海报上少了一个人》）做过一个发言，专门讲图像之塑造。我认为，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他们都想建构“英雄创世纪”的新叙述，为此去不断修改、完善图像。这背后的思想逻辑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一种绝对论，也就是为了表现某一种概念、思想及其代表人物，认为他体现了人类的所有美德，所以必须将有关记忆或记叙反复修改或者删改，使之符合现实的“完美”。所以“第二历史”应是国家主义的文字影像再造工程的产物。

除了修改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比如悬挂领袖的头像，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也是从苏联来的。它是精神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中国过去的历史传统里也有，特别到了晚清以后，供奉皇帝、太后的牌位表达某种政治诉求，像保路运动时那样。后来列宁去世，广东开纪念大会，列宁的大画像就挂上面，孙中山的照片也有。这以后就成了惯例。

中共一开始并不挂自己领导人头像，都是挂马恩列斯，或者有时是马恩，有时是马列。挂毛的头像是在延安以后。但在

1939年的延安，是挂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像。当时张闻天对中央宣传部还有一点影响力，这也是跟苏联学习的。

苏联是双重制，一方面挂斯大林，同时在五一和十月革命节的时候，挂所有政治局成员的像。而且苏联有个传统，除了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之外，还有一些像莫洛托夫格勒、伏罗希洛夫格勒、加里宁格勒之类的命名。这方面，斯大林心眼不那么小，不是一个人独霸，跟他混的人都有一个小“格勒”。

苏联也挂马恩的像吗？

挂。苏联挂得最多。一般而言，只要是共产党国家，都是同宗马列，从苏联到中国都是如此。中国在文革期间把毛看作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但仍然是说“马恩列斯毛”，当然毛的像最多。建国前和开国之初，大军南下，为了壮大党的声势和顺应国统区人民对中共的认知，挂过朱毛像，但不挂政治局委员像。中共八大后，挂过常委像，以后就不挂了。但五一，十一，还是要在天安门广场摆放马恩列斯像的。唯一不同的是朝鲜，现在极个别时候才会挂马克思和列宁的像，而且不摆正中，只摆侧面。它还正式在党章中宣布取消马列主义。它是共产党国家，但它真正实现了话语自主权。金日成是非常注重建立以自己为本位的词语的，他养了一批理论家，像前年去世的黄长烨，就是一个所谓“主体思想



的理论家”，黄先生肉麻当有趣，为此还沾沾自喜。他凭什么当上金大（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又爬到中央书记的高位，而且一直高官厚禄呢？就因为金日成要搞自己的一套，而黄长烨能提出“主体思想”。在苏联之外，这样重视理论解释的，只有中国和朝鲜。中国因为人口多，东方国家的革命有特殊性，提出自己的解释来彰显我们的独立自主等；朝鲜则左右开弓，既反亲苏的“教条主义”；又反亲华的“事大主义”，唯一正确的是金首相的“主体思想”。其它

比如越南，从没有自己成体系的理论，没有“胡志明思想”；东欧国家从四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垮台，更是一个都没有。当然它们是在苏联的严密监控下。苏联牢牢抓住自己是马列主义正宗的地位，严格监控任何可能与它不同的东西。就“自主性”而言，朝鲜可谓登峰造极。金日成特别重视实现对干部、对人民完全的精神和思想占领，而且源头也不要，更彻底、更全面，好像横空出世，天降祥瑞，直接从白头山蹦出来的。

放松与转型

文革后期“林彪事件”可以看作是这套话语体系开始放松的转折点吗？

对，因为它把文革的合法性以震撼性的方式破坏了。文革本来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以后各个概念就很难互相支持了。尽管我们现在知道林彪在文革期间不过问很多具体的工作，但是文革是跟林彪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六十年代他营造的“新文化”即个人崇拜文化，是搞不了文革的。他这面墙一倒，整个文革的大厦就倒了，虽然最高领袖靠他的坚强意志力撑住了，但是他知道这危害太大。所以1971年以后，文革所谓向上的、进攻性的态势弱了，变成保守性、捍卫性的运动，这时候提出的是“保卫文革成果”、“反击右倾回

潮”、“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所以说“就是好”，就是因为有人说不好嘛。

当然，如果没有“林彪事件”，也很难说文革可以持续多久。“继续革命”必须建立在几个基础上，第一是群众和领袖持续的沸腾般的革命热情，人们的激情、理想主义始终燃烧到沸点状态。就像古巴的卡斯特罗，经常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四、五小时，走在哈瓦拉反美大游行的最前列也不知疲倦。但像老卡这样的国际共运领袖太少，和卡斯特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十八年，竟成了享受型生活的实践者了（他狂热喜爱好车和勋章）。而出身工人阶级的赫鲁晓夫虽然在政治上尊敬铁托，但他很不喜欢铁托的生活奢侈和对宝石钻戒的爱好。然而，勃列日涅夫和铁托



的私人爱好都是人类的基本弱点，这就是人会追求生活的改善或舒适生活，他们是领袖尚且如此，遑论一般群众？所以，即使后一个运动接着前一个运动，把“不断革命”的口号叫得震天响，也不能彻底改变人的这个特性，特别是当领导不能和群众同甘苦时，把所有革命领袖请来做动员报告可能也不行，因为最后人们也会得运动疲劳症。所以有欧洲人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胜利之日也就是革命死亡之时，可能针对的就是这种精神倦怠和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吧；第二是切断一切中外文化联系的渠道，比如像1966年8月份全国图书馆就关门了，

《人民文学》、《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等很多杂志也自动宣告关门。一定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整个的社会信息单一化，信息只来自于一个方向。这样就可以通过“两报一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实现领袖对人民的直接引导。而全国各省市的报纸，完全是《人民日报》的翻版。

如果出现了异样文化，就会产生一种潜流。所以即便对马列，在那个年代也从不提倡大家都去广泛阅读，因为读多了，有人就会产生自己对马列的释读，而这种个人化的释读，有些是和文革新秩序严重对





立的。比如杨小凯，他的《中国向何处去》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当时就被抓起来。宁夏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把一些成立马列主义自修大学的青年人枪毙了几个。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是学马列就可以了，就了不起了，学马列必须在正确的指导下学，不能自己瞎学。我记得当时最高领袖不断强调，“读一点马列”，“读一点历史”等。革命战争时期，他多次批评“假马克思主义者”，说“书读多了也是坏事”。这种思想影响很大，在正确地反教条主义的同时又无形中和党内长期存在的推崇、鼓励农民文化以及大老粗的思想和作风融合一体，而那个时代人们正是以“我没文化”，“我只读过小学”，“我是大老粗”为荣的。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全社会已经有怀疑和批评，最高领袖把阀门稍微开了一点，这个时候才有内部书的较多出版。特别是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感觉到有这个需要，出版的书更多了，而内部书在文革前只有过少量出版。

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况如何？这套体系变化了吗？改革的词语体系与革命词语体系是什么关系？

改革这方面我没有专门研究，但是它有转换。首先把阶级斗争转换为经济中心，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肯定是大转换。从世界上的人都要分左中右，到现在以人为本，这也是一个大的转换。但

是，改革开放以后，主导者仍然要掌握对理论的解释，这个基本上没变。

像唐德刚这样的学者，对未来抱有非常乐观的看法，您对历史的走向倾向于乐观还是悲观？

怎么说呢，谈不上非常乐观，也谈不上非常悲观。当然还是希望整个发展态势是朝着好的方面演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众权利得到保护、公民社会的成长、公平正义成为基本原则，等等。

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些基本条件。第一，与外部的紧密联系，如果像朝鲜今天这样切断和外部的一切实质性的联系，那什么都谈不上；第二，今天讲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要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则是20世纪的人类经验，不走这条路是非常可怕的。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在领导者和民众之间，就有一种比较好的互动，未来可能还不错。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那前景就堪忧了。因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非常大，有些阶层天生要扩张自己的利益，这就很难办，就会造成社会的紧张。如果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发酵，再有一个超凡魅力的领袖，那未来就很难说了。

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不一定将来就比现在好。比如南宋，虽然有各种各样严重



的问题，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程度来看，一定比元朝好，可还不是被元朝灭掉了吗？当然，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进入世界体系了，不至于那样吧。

但是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确实在发酵，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以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为事实依据。

是啊，但是要看是否可控。如果可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这只是一个局部的现象，代表一部分人看法，不至于成为笼罩一切的、压倒性的、具有宰治地位的思潮，那问题还不大。

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问题，使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定要走渐进的、改良的道路。人口众多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所以有学者提出，小步走、不能停，就是不断要做一些重大的改

善。中国十几亿人，要保持经济增长和解决社会问题，同时推行公平正义的落实，几个方面要结合在一起做，确实很不容易，最近三十多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有进一步做好的空间，许多事，可以做，并不是不可以做，先从局部做起。不是说人多就一定不能做，只是人多可能会在做的过程中有一些具体的考虑。换个角度讲，就是因为这么多人，不做的话，万一什么时候有个社会大爆炸，前景不堪设想。其实无非两种情况，一个是小步走，渐进改革，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同时做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另一个是能拖则拖，危机什么时候达到临界点，就很难说了。

一般历史研究不搞预测，只研究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研究历史，都有某种程度的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所以对某些问题有些看法，不一定很深入，也是自然的。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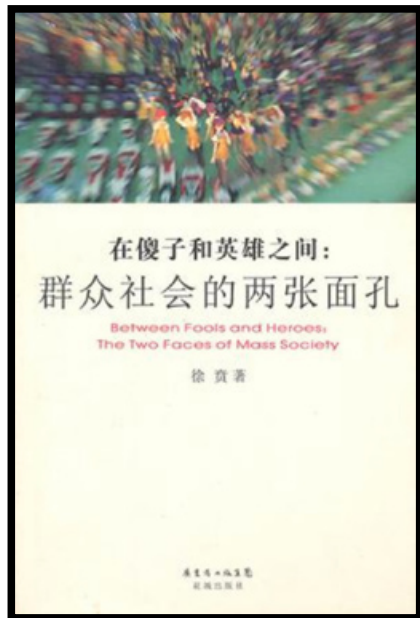
立场与学识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 （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

不久前，陶东风在对《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一书的书评《徐贲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中，除了强调徐贲著作表达了强烈的公共关怀，还概括了徐贲著作的特点——我国知识分子公共写作中罕见的特点：“可以非常‘随意’、非常灵活地把西方理论（可以是政治哲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的、心理分析的，等等），和一个具体的中国社会问题或现象联系起来，纵横捭阖，挥洒自如。”陶东风举例：在《和谐社会与公民社会》一篇文章中论述什么是和谐社会，徐贲就援引了“十余位西方理论家的观点，并且这些理论的运用都有明确的指向性”。

我在《勇敢地谈论道德：》一文（刊于《社会家茶座》，第3辑）中，曾谈到徐贲“是在追求欧洲传统的‘知识整体性’的学术理念”，没有论及他的写作特色。拙文想接着陶东风的书评，再谈点与徐贲的写作特点可贵之处。

徐贲在《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的序里，谈到了他在美国求学期间所收的教育——“希腊思想”研究班（seminar）的研讨，阅读、讨论古希腊以来的涉及文



学、历史、哲学、科学、社会政治的“伟大著作”，如何使他这个文学研究者阅读和写作方式和目标，变化而深化、体会到文学的公共性，追求理性的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尽管今天我国学者也提倡人文教育和极少数大学设有综合性人文教育科目，可是单就我国目前的学术出版物（特别是大学的学报）来看，我国与欧美大学的人文教育的质、量和目标都不能同日而语。陶东风在评价《傻子与英雄之间》时把始终追求公共关怀、“敏感地切入当下中国一系列尖锐的公共议题”作

为徐贲著述第一位的可取之处，拙文所想强调的却是徐贲著述有我国知识分子公共写作所稀缺的业余与专业的结合、学术性与批判性相结合的特点，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每天诞生层出不穷新奇的反映社会病理的事件。随手从哪个网站的新闻网页中，都很容易从热点中挑一个民众关注的来评论。随着近10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病状恶化、这类事件的同步增长，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写作数量也急剧增长。陈舒劫在《网络知识分子公共话语的反思》（《二十一世纪》2011年6月号，31-41页）以2009年的“绿坝事件”为例揭示了这一增长背后隐藏着一种畸形倾向。在当今中国，因为“批判知识分子”具有一种身份符号的象征，陈援引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尖锐指出“绿坝事件”隐含着某些公共写作者凭借制造特定的文化符号消费而获取文化象征资本的意图：“象征资本开始不被承认，继而得到承认，并且合法化，最后变成真正的‘经济’资本，从长远来看，它能够在某些条件下提供‘经济’利益”。陈舒劫行文措辞还是很客气、委婉的，实际上隐含这样功利性意图的话，根本算不上公共知识分子。暂且不论潜在写作目的，这种倾向至少表明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时评写作，追求公共有余，学理性严重不足。

在这里，我要再度借用陈舒劫在文章中已经引用了的戈德法布（Jeffrey C. Goldfarb）毫不掩饰自己对公共知识分子不满的话：“公开讨论的质量低劣是

我最担忧的问题。”（40页）如果公共知识分子也只具有普通市民那种义愤，以常识性的判断力来议论的话，就丧失了其知识分子原有的知性权威。

前几天网络上看到孙歌在某大学做题为“我们要向丸山真男学什么？”的演讲，我不知道她演讲的内容，但如果让我回答这一提问的话，我要说：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学者的代表丸山真男故后10多年，依然还有相当影响力之原因，在于他能运用广博西学理论分析日本社会现实、事件、通过具体的事实归纳出抽象的结论。——这是我国公共知识分子要学习的。

去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专题论文集《论俄国革命》（戈登·威尔斯、彼得·巴赫编，潘建雷等译，上海三联书店）所收的文章也都是为媒体写的时事评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韦伯却不好意思地强调这些文章只是“编年史”，是“编排非常蹩脚的记录的集合”，“没有提供什么东西”，自己的文章中没有“专业知识”。（131页）当然，韦伯对俄国革命的考察“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叙述”，他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最终还是分别被收入1906年2月和6月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中。韦伯之所以对自己的时评特意表现出谨慎、谦虚的态度，那是因为时评实际就是“当代史”，甚至往往很快在“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就能证明它是错误的或者过分简单化了”。今天，与欧洲史学家不同，实证主义占统治

地位的北美史学家一般都谨慎地不涉足现、当代史的原因也就在于此。《论俄国革命》所收的文章也为中国喜欢写时评的学人提供了经典楷模——在撰写时评时，如何在叙述具体事件和事实时做出保持距离的、抽象的、学理性的概括——除了立场，学识也是很重要的。韦伯和以后的阿伦特、哈贝马斯等受过德国新人文主义余韵熏陶的公共性写作，都难用“专业”或“业余”来对他们定位。

斯蒂夫·富勒(Steve Fuller)在《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2005)中,虽然强调坚持社会正义公共立场最为重要,但是作为不可缺的必要条件,面对复杂的社会新课题,知识分子需要追求一种与学院专家“单一的真理”不同的“完整的真理”,但是任何时代都少有现成的“完整的真理”传递下来。”一般的专业学者掌握的往往是“单一的真理”,只是“完整的真理”中的一部分,而且仅仅满足于掌握“单一的真理”,甚至“把探索的手段当作目的”。富勒认为,知识分子面临的难题(社会病理、事件)具有历史未曾有之新及其综合性复杂的难度,加上知识分子在作为历史上的个体也不可能掌握人类社会的“完整的真理”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做的事情:

“犹如擅自进入别人的领地,摘人家的果子,抢夺别人的成果”。换言之,广博的阅读、援引前人的思想成果,也是知识分子必需的路径,除了追求公共正义之外,这是不可缺的一个必要条件。

富勒说,真正的知识分子相信:探索

真理的路径,在还没有到达终点之前,往往不止一条。如果把逼近真理的路径加以有限的限制的话,那种路径只是权力庇护下的御用工具。富勒援引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科教授通·斯文森(Don R. Swanson)在20多年前提出的“未发现的公共知识”观点。即只要精细地系统地检索现有文献,有时就能解决一些现在医学研究中难解的问题。因为这些已有的科学研究文献,有些本来并不是针对现实世界,可能是远离我们的现实世界,而且作为现代科学研究,有专一、抽象的倾向。但是,为了有效探索现实问题,不能依存单一领域研究,必须从各种各样的学科文献入手。解决现实问题,就期待出现这种超逾单一领域的研究者的收集、综合起来文献。斯文森自己就通过文献检索一步一步逼近治疗雷诺病(Raynaud's disease)的方法。

富勒认为发现未曾有的公共性的知识甚至就是知识分子一种生存方式,知识分子要向虚张声势的权威挑战,就要跨学科领域,养成庞杂的阅读习惯。所以,徐贲在《和谐社会与公民社会》一篇文章中论述什么是和谐社会就援引了“十余位西方理论家的观点,并不是不必要的“掉书袋”。而且从多种学科的先学学术名著中旁征博引,吸取追究事物根源的养料,增强可信性的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延伸阅读的各学科的学术名著之线索。现代科学研究细分化趋势的反面,却因为现代社会及人类活动也日益变得复杂,也越来越需要学

科综合协同作战。笔者知道自己天赋学力有限,读书的喜好与我国广大追求学术独创性、创建学术体系的读者不太一样,喜欢阅读这种“掉书袋”式大量援引的著作,它们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艳丽、芳香学术大花园,从另一侧面来看,其中也反映著者用功之勤,(顺便说一下,瓦尔特·本雅明一直梦想写一篇完全是引文的论文,最后也没有实现。但是他的这一抱负,在我国可能要被认为没出息——缺乏独创性。)所以买书、借书之前,首先浏览一下最后的引用文献,以此来判断书的价值。可以说徐贲业余写作的“时评”和“政论”的学术含金量,并不亚于大多数中国国内某一相关学科的专家专业水平。相反,这几年不少学院派的学者争当公共知识分子,大量精力花在时论上,学力正在日益退化,时评的战斗性、说服力也在日益衰退。学者之间就某一事件争论时,大多出现争论者的论据仅局限于自己狭隘专业范围之内,超出范围,彼此都就显得捉襟见肘,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呈现“鸡对鸭讲”的状态。

其实,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在指导学生学位论文时,都知道文献回顾的重要性。苏小和在《先知杨小凯》一文中说到,杨小凯当年在狱中苦思冥想写下了一本厚厚的经济学笔记。之后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了非常有体系化的理论了,只是他在监狱里无从得知。张景中院士曾回忆说:想得多但读得还少,是我的弱点。大一时,在解析几何教科书上看到函数方程 $f(x+y)=f(x)+f(y)$

的连续解只有 $f(x)=cx$ 。想到一个确定它全部解的方法,写成论文,居然顺利地在《数学进展》刊出。没有高兴多久,在华罗庚的指点下得知早在1920年德国哈默尔已经做了这个工作。富勒在《知识分子》中也说,学术创新、进步大多也是一点一滴缓缓进展的,学术论文注释中含有学理的来龙去脉线索,读起来往往比正文论述更加有趣。而公共知识分子也就要从更广的领域入手,威胁御用学术专家的权威。

从知识整体性出发,在广泛阅读、思考后写作,还可以尽量避免囿于某一学科、某一学说导致思想上的偏颇,会有更清醒地认识。比如,现在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在批判现在教育体制弊端时,兴起一个缅怀民国教育热。有些怀旧文章根本不提清末到1949年半个多世纪中清政府、民国政府教育行政中现代“官僚制化”——国家权力对教育控制,无限美化那半个世纪中大学之运行管理。徐贲给已故的父亲文集写的“编者序言”里有一段话,涉及抗战时期我国大学历史的真实,委婉提出批评:“我父亲是歌乐山时期武大学生……当时的校园并不是一个毫无政治管束的文化乌托邦,而是一个专制国家政治不肯轻易放过的思想领地,只是由于教授和学生拒绝放弃他们的思想权利和心灵自由,校园才不至于成为专给青年洗脑的地方。”(徐干生,《复归素人》,新星出版社,2010年,3页)又如,道德和制度关系问题上,徐贲也不片面赞同制度决

定一切论，不绝对否定道德的社会、历史功能，他在最近《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马基雅维利的启示》一文中还是坚持先前诸多著述中的立场，强调：民众的道德堕落对社会政治革新也是一个难关，一个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是建立在国民的伦理观念基础上的。

徐贲大量涉足、援引各个学科领域成果的另一个特点：他大多数文章是从第三者的立场叙述，叙述和论证合为一体。援引的文献即使非常艰深，徐贲通过自己理解后的转述，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通过“讲故事”，文体变得平易，显示

他的“业余性”，而这种“业余性”正是公共性所必需的。与故意为了提高知性深度，增强权威性，模仿欧陆哲学家“深渊”的语言那种学者所写的、避开事实叙述、矫情的政论不一样。能读懂那种读起来拗口、艰涩的文体和容易产生歧义的符牒式语言，只有具有某种神秘力量的“圈子里”的同仁了。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抽象的语言表达，也就失去公共性了。因为追求过度抽象论证，徐贲涉足的“超女”、“范美忠”、“夹皮沟”乃至“巴甫洛夫·莫罗佐夫”之类的故事都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宏大叙事中。Q

永田洋子和联合赤军事事件

特约撰稿人 刘 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2011年2月5日，被认为是1971—1972年间发生的“联合赤军事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极端左翼活动家、曾任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永田洋子，在位于小营的东京拘置所内死亡，终年65岁。死因是脑肿瘤所引发的多器官衰竭。

永田洋子于1972年2月17日被捕，1983年被东京地方法院以私刑、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尽管永田不懈上诉，与代表国家的公诉方做出“对决”的姿态，但二审、三审仍维持原判。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93年2月19日，日最高法院核准死刑。2001年，永田请求重审。2006年11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其请求。其间，永田罹患脑部肿瘤，并于狱中实施手术，术后瘫痪在床，丧失话语功能。鉴于永田的健康状况，其辩护人根据日《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务省申请不执行死刑并获准。因此，从1993年起直至死亡，永田的身份始终是死刑囚。而如果从被捕日起算的话，被监禁的时间长达39年。

永田洋子（Nagata Hiroko），1945年2月8日，出生于东京都文京区的本乡。经过一贯制的田园调布学园初高中部，于1963年进入共立药科大学（现庆应义塾



大学药学部）。作为从贫困家庭凭个人努力考入大学的苦学生，永田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乖乖女”。据她高中时的班主任回忆，“大学合格结果发表的翌日，她来找我，谈起大学扣了一笔不菲的捐助金：

‘为什么要收这么多钱？家里的负担岂不变得更沉重了。’说着，眼眶就湿了。”

图为永田洋子年轻时的照片

但贫困本身，并没有成为永田的自卑感。她在高中毕业的留言册上写道：“即使进了大公司，也不想成为那种被称为人的机器”；大学毕业时的留言册上，则写着“怀抱勇气，不忘微笑地活着”。大学时代的同窗对永田的评价是“非常好的人”、“一个有勇气的人”。

虽然贫困并未构成自卑感，但永田始终对两件事情耿耿于怀，说自卑感也并不为过：一是不足150cm的身高，使她自觉是一种“损失”，“总会被男人当成孩子”；二是患有严重的甲亢，眼球突出，颈部留有一道手后疤痕，且自认为无法生育。这两件事，被认为对永田的人格构成了相当的影响。

大学期间，开始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学生组织（社学同ML派[○]）的活动，并于1964年5月正式加盟该组织。1967年大学毕业后，永田一边在庆应义塾大学病院读研究生[○]，一边在该病院的药房做了一段无薪药剂员。后作为药剂师，先后就职于东京都品川区三水会病院和济生会病院。在病院工作期间，永田便参与工会活动，曾追究院方在购入药品时和卖给患者时使用双重帐薄的做假账、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与此同时，因社学同ML派的关系，被原该派干部M.K和川岛豪主导的分派“警钟”发展为成员。永田参与组织活动颇积极，并在女性解放问题和年终奖金团体交涉等劳动问题上有一定的成果，后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和本人的希望，辞去工作，专事政治活动。

后“警钟”与因支持中共“文革”路线而被日共除名的神奈川县亲中派合并，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后更名为日本共产党（革命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简称为“革命左派”，领导者为M.K和川岛豪），永田为最早的成员之一，与石井功子和川岛阳子一道，被称为“京滨安保三女战士”。1969年底，川岛豪被捕后，永田进入领导核心，并于翌年9月被投票选为革命左派的最高领导人。根据狱中领导人川岛豪的指示，永田作为组织的最高责任者参与策划、指挥了旨在夺取武器的上赤塚警署袭击事件和真冈枪支店袭击事件，安保斗争开始向过激化、暴力化发展。

与此同时，内部权力斗争和清洗也开始升级。在印藩沼事件中，永田不仅下达了对两名试图逃离训练基地的同志处刑的指示（美其名曰为“保护组织”），而且发挥其药剂师的专长，对其中一名同志（H同志）采取行动时，谎称内部酒会，由永田亲自调配了催眠剂，诱其喝下。趁H神志不清之时，将其塞进汽车，拉到千叶县西北部印藩沼杀害，并埋尸灭迹。至此，安保斗争突破了杀人的底线，为后来的导致12名同志惨死的山岳基地事件埋下了伏笔。

1971年，革命左派与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联合，7月成立了联合赤军（当初称统一赤军）。12月，革命左派狱外领导集体宣布与狱中领袖川岛豪“切割”，与赤军派结成新党，森恒夫任委员长，永田为副委员长。鉴于革命左派、赤军派

[○]全称为社会主义学生同盟马克思列宁主义派。

[○]日本大学的研究生不同于我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进修性质，无学位。

斗争的暴力化升级倾向，政府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取缔、镇压措施，在全国所有的酒店、汽车旅馆、车站、神社等两万五千处公共场所和出租房屋中展开地毯式搜查，反政府据点被查抄，有关人员被逮捕、通缉，“革命家”们被迫辗转逃亡。在这种逼迫之下，革命左派和赤军派也拉开了以警察为目标的“歼灭战”的架势。一时间，警署爆炸等袭警事件层出不穷，对抗白热化。

但毕竟处于随时被取缔的非法状态之下，常年的奔波逃遁生活所带来的饥寒交迫、营养失调、疲惫压力导致领导人判断失误迭出、组织内部士气低下，亟需休养生息、集中训练（包括射击等军事训练），而这在都市部已不可能。永田提议既然信奉毛泽东思想，应该去中国进行思想和政治学习，可现状之下，被认为是缺乏现实可操作性的“空论”，本身便是领导人判断能力低下的标志。该组织的第三把手、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坂口弘基于法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历史经验，提议山岳基地方案，得到了永田的响应。1971年12月，联合赤军在原赤军派的位于山梨县的新仓基地实施了联合军事训练；12月20日，又转移至革命左派的基地——群马县境内的榛名山基地，并宣布结成新党。此时，两派集结于山岳基地的成员共计29名，其中包括10名女性成员。

在榛名山基地，始于“总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升级，最终发展成一场血腥的内部清洗运动。后因有成员逃跑，为了组织安全起见，转移至迦叶山基地；

继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又转移至妙义山基地。1972年2月17日，森恒夫和永田洋子一度下山，就在二人携活动资金重回妙义山的途中，被搜山的警察发现。二人挥动冰凿和匕首，顽强拒捕，后被警察制服，束手就擒。坂口弘、坂东国男等5名联合赤军分子从山岳基地突围，逃往长野县北佐久郡河合乐器公司的一片疗养所内，扣押人质，继续负隅顽抗，直至2月28日被警察机动队强行突入，5人被逮捕——即所谓浅间山庄事件（但永田因此前已被捕，与该事件无关）。在日本当代史上，发生于1971年底至1972年初、导致12人私刑致死的山岳基地事件和演出了激烈枪战的浅间山庄事件合称为“联合赤军事件”。

至此，困守山岳基地的17名联合赤军分子被悉数逮捕。根据被捕的赤军成员的供述，事件的全貌被揭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12名成员在内部整肃中惨死。警察搜山的结果也被媒体披露出来：被认为是清洗运动开端的榛名山基地，由于现场被赤军分子焚毁，没有留下太多的证据。但是，在迦叶山基地，警察发现多处大小便的遗迹和被刀具剪切的衣物碎片。这被认为是杀人的铁证。因为人在窒息死亡时，体内残留的粪便会自动排出体外；而想要从死后变得僵硬的尸体上褪下衣服（出于埋尸灭迹的需要），只能用刀具裁断。

这桩惨绝人寰的反社会性事件，经过新闻媒体的曝光，给沉浸在消费主义中的社会以巨大的冲击，极大撼动了民

主国家自由民主和平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在警察机动队突入浅间山庄，与在山庄内顽抗的赤军分子发生激烈枪战时，全国各大电视网实况直播，收视率总和高达89.7%，创下电视发明以来的记录，至今未被打破。这些满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言必称“革命日本”和“世界革命”的极端左翼“革命家”，缘何走上残害同志、虐杀无辜的道路，到底是“革命”意识形态本身的错误，还是“人性恶”所致，引发了全社会深深的思考，至今争论未已。联合赤军事件导致左翼意识形态的破产，标志着发端于六十年代初的反安保运动的终结。浅间山庄事件发生时，在一些社会党国会议员和左翼媒体中还多少有为赤军分子

辩护的同情言动，但随着山岳基地事件自我肃清的真相和联合赤军实态的浮出水面，左翼政治势力彻底噤声、失语，甚至有人反戈一击，从“赤军拥护”转向为谴责暴力的“赤军批判”立场。

那么，联合赤军残酷的内部整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有哪些特殊的机制和深层原因呢？40年来，尽管司法判决早已尘埃落定，但围绕事件的背景和成因，在媒体、学界及当事者（数名联合赤军领导人及核心成员，均出版过不止一种著作、回忆录，陈述事件经过，厘清自身的责任）之间，有形形色色的说法，百家争鸣，迄无定论。大致说来，比较有说服力者主要有二，即从意识形态分歧和领导人的理论偏执层面解读的意识



图为赤军

形态说，及试图从领导人个人的出身、经历、性格中寻找答案的领导人个性决定说。公平地说，两者均有不足，前者过于强调“观念改变世界”，但由于过分忽视了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影响，客观上甚至不无将反社会性犯罪“合理化”的一面；而后者，则被认为过于“诛心”，易陷入阴谋论，对思想、信仰对人性的塑造、改写力量评估不足。

就意识形态而言，构成联合赤军的两个母体——革命左派与赤军派，原本在政治路线上便存在根本性分歧。革命左派的思想资源与日共左派毫无二致，都信奉毛泽东思想，支持中国“文革”，只不过比后者更激进。他们认为，其作为革命左派的“独特性”，并非基于独特的路线，而只有通过斗争的激进化才能得以有效发挥。因此，头可断、血可流，激进主义不能丢。力倡武装斗争，在旨在阻止首相（佐藤荣作）访美的羽田机场行动中投掷燃烧瓶，高喊“反美爱国”的口号、在美军基地设置定时炸弹等，一开始便走上了过激的道路。赤军派的革命理论是泛托洛斯基主义：通过日本的革命，形成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党和军队；然后在世界革命最高司令部的革命日本与革命之敌的“总本山”美帝国主义之间，酿造“环太平洋革命战争”的形势。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群言必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革命家”，其所张扬的革命理论纲领竟然与帝国时代的战略家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争论”有某种内在相通之处。日本国内众多学者认为，之所以会

发生后来那种极端化的组织内讧，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组织无视彼此政治路线的不同，出于某种吃紧的现实需要而匆忙“野合”的结果。就是说，内部肃清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这种“革命”逻辑早就深藏在构成联合赤军的两个母体的革命意识形态之中。

对此，联合赤军的领导者们并不讳言。相反，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意识形态的错误，把骇人听闻的反社会、反人道罪行包装成极端的理论迷狂的结果，而回避个人性格原因，乃至人性的幽暗。1973年元旦，在被囚的单人监房中上吊自杀的最高领导人森恒夫在遗书中承认，全部责任在自己和永田，但把事件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对革命左派的理论错误的“纯化”。组织的三把手坂口弘为也认为：“极而言之，山岳基地事件是发生于森恒夫君的观念世界中的事件。”如此一来，把组织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仪式化”，并发展成对个人的私刑凌虐，乃至肆意剥夺生命的骇人罪行，便被合理化为某种理论的迷误。当然，为森开脱，也是为自己开脱，但如此开脱能否在法庭上奏效另当别论。所以当永田在狱中听到森自杀身亡的消息后，不禁狂叫：“狡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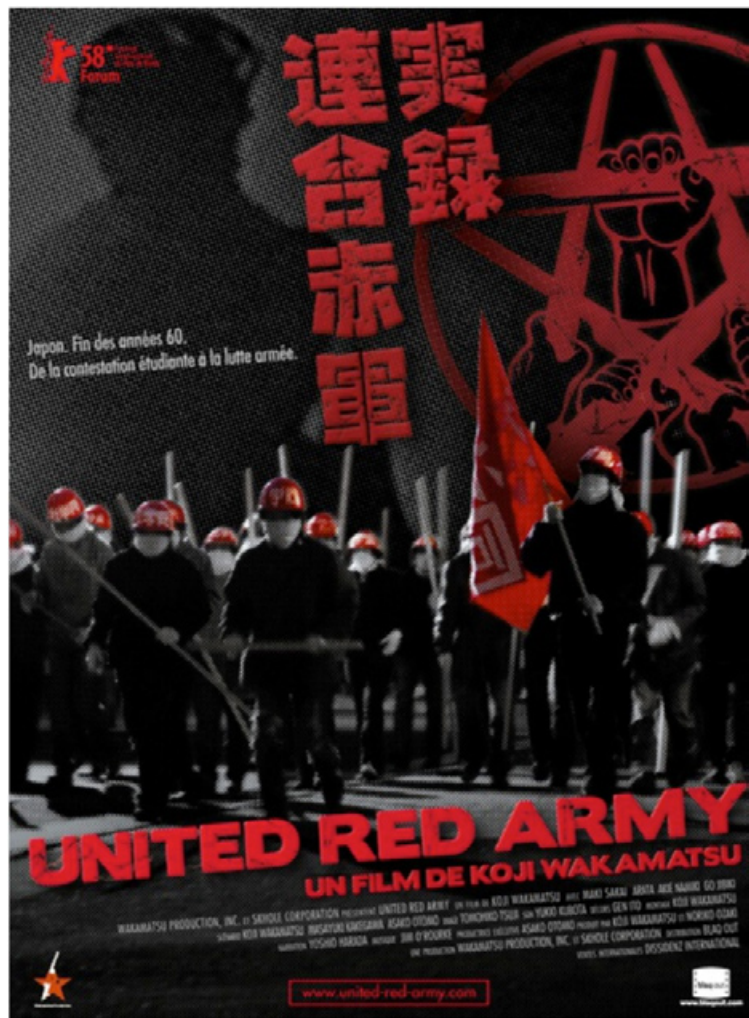
对于在事件中，一把手森和二把手永田，到底谁的主导色彩更重的问题，历来有争议。但与森和三把手坂口相比，永田显然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女性身份。1979年，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如此写道：大量虐杀，“是确保了绝对的权威和权力的森

和永田，为维护其权威、权力和地位计，对部下的不信感、猜忌心、嫉妒心、敌忾心所致”。在1982年的判决书中，更增加了所谓“旺盛的自我表现欲、感情用事的性格……女性特有的偏执、阴损和冷酷的施虐趣味”的措辞。而“女性特有”云云，在当时便令众多的女性知识分子蹙眉，被自由主义媒体批判为歧视女性的“问题判决书”。但法院的判决，作为基于详实周密的司法调查、取证的基础之上的结论，显然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永田广为媒体所诟病、被妖魔化为“魔女”、“恶女”者，主要有两点：

一是说她有极其强烈的权力欲，且为权力不择手段，身后永远站着一个强有力的男性，通过与自己有肉体关系的强人“大物”攫取最高权力。如果不论动机，只谈结果的话，这确是一个事实——她始终跟组织中实力派领导人“有一腿”：早在革命左派时期，永田曾遭有妇之夫川岛豪强暴，但她选择了维护组织的最高利益，未事声张，息事宁人。但出于自身对恋爱婚姻纯洁性的理想，要求川岛离婚，与自己结合，却遭到后者暧昧的延宕应对。有迹象表明，永田内心的屈辱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男女观，使她对自由性爱持严厉的否定态度。川岛豪入狱后，与坂口弘结合。在山岳基地后期，宣布结束与坂口弘的事实婚姻，而与联合赤军最高领导人森恒夫结合，一时令基地的同志们张口结舌。可永田无论如何不是放荡女，其婚姻观毋宁说是相当“古典”的，她厌恶不以婚姻为归宿的

恋爱和任何以自由恋爱为名的“杯水主义”。因此，对永田的性选择，也许只能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

二是对组织中几位女性成员的残害，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本能的妒忌使然。这几位女性，有的是美貌人妻，有的是身怀六甲的临产孕妇，如果用普通标准来衡量的话，都是简单而幸福的小女人。其中一位名叫远山美枝子的赤军派干部的妻子，身高170cm，面白体长，风姿绰约，是公认的联合赤军的看板美女。像那个时代多数年轻漂亮的女郎一样，远山留披肩发、化淡妆、戴戒指、足登时



图为《联合赤军实录》电影海报

髦的登山靴，可这一切成了罪状——远山被要求“总结”，反省、清算自己身上的小布尔乔亚根性。“总结”很快就升级为大批判，继而武力相向，且专打女性最敏感的部位，脸部、臀部、大腿等。远山被迫告白以往的男性经验，同时用力抽打自己的脸。在这一幕上演到“恰到好处”的时候，一直在一旁静静地观赏的永田，突然蹲到远山的跟前，拿出一面小镜子，命令远山照面：“看看你丑恶的嘴脸！”远山的身体被反绑成一个呈逆向弯曲的大虾的形状。可当几名打手要她“像跟男人睡觉时那样叉开双腿”，以便遵照森恒夫的命令，试图向其双股间插放木柴时，却被永田制止道：“那样做未免也太矮小化了吧。”就这样，远山被凌虐致死。不仅远山，男女恋人、亲兄弟、怀孕8个月的孕妇连同其腹内的胎儿……在山岳基地，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私刑致死者多达12人！

对杀害同志的根本原因，永田认为是革命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对把动因动辄归结为与革命运动无关的个人资质、欲望的判决主张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并坚决抵制，不懈反击。她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日本左翼政治中无处不在的、把党派主义和左翼党派作为一种当然的、无需论证的前提加以强调的一党独裁，同时指出联合赤军事件与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政党中频频发生的暴力、虐杀事件（尤其是日共在战前和50年代所策动的一系列事件）具有某种内在相通性。她后来在狱中出版了名为《十六

个墓碑》的回忆录，虽然对事件的起因等有一定程度的反省，但重在厘清个人责任。尽管她承认虐杀同志是一个“错误”，但直到最后，都不认可其所参与、主导的“斗争”本身也是一个“错误”。所谓“十六”，应该理解为是永田个人对在山岳基地事件中被迫害致死的12名同志，加冤死于印藩沼事件中的两名，再加上在上赤塚警署袭击事件中牺牲的柴野春彦和狱中自杀的森恒夫，共计16名亡灵的祭奠之意。但同为女性，永田不可能不知道，身怀8个月身孕被私刑致死的赤军干部吉野雅邦的未婚妻金子美千代，实际上是两条生命。

尽管对组织内讧和虐杀同志的动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没人否认，导致联合赤军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残酷斗争的意识形态。日文中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源自德文（Ideologie）的外来语，作家司马辽太郎翻译为“正义的体系”。但必须指出的是，联合赤军的“正义”是虚幻的、颠倒的正义，用美国社会学者斯坦因霍夫（Patricia G. Steinhoff）的话说，是“通向死亡的意识形态”。坂口弘在狱中出版的回忆录中曾经写道，如果没有森恒夫和永田洋子的提前被捕的话，那么以“总结”的名义的私刑虐杀肯定会延续下去，最终也许会发展到自己与森恒夫的对决。其实，同样的假设，对永田来说，也一样成立。纵然是事实婚姻的合法夫妻，但在赤军的铁一般坚硬的“革命”意识形态面前，根本就不是问题。❶

忘了它吧，这是唐人街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美国 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X，对于唐人街，我所有的印象都来自一堆形形色色的好莱坞大片与一群奇奇怪怪的华裔美国作家的小说。说实话，对于在电影或是小说中，已经符号化为暴力、罪恶、肮脏或是窒息、压抑、悲愤的唐人街，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偶尔我会耸耸肩，就像罗曼·波兰斯基那部与唐人街无关的电影《唐人街》结尾处，警察对Jake所说的那样告诉自己：“忘了它吧，这是唐人街！”

因此，第一次到波士顿唐人街，我依然没有任何感觉，既不觉得新鲜稀奇，也没有恍若回到中国的亲切感，只是觉得小，怎么这么小。我仰头喝了一口可乐，不觉就走了一半，再仰头喝一

口，竟然就走完了。这我不禁有些羞愧，感觉自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骨碌就把这么美好的东西给吞进肚子里。于是，回头放慢脚步再走，寻找电影或是小说中告诉我的唐人街应有的那些东西，即便只是一个符号：重檐画彩的中国牌坊、参差错落的中文招牌、鳞次栉比的中国餐馆点心铺和小杂货店、几乎可以买到国内任何副食品的中国超市、说着广东话与英语的中国人、乱扔垃圾、随地吐痰、拥堵、脏乱差等，确实，波士顿的唐人街虽然小，但唐人街应该有的可以有的似乎都有了，应该看的可以看的我都看了。我可以走了。我对自己说。



1

让我在唐人街停步驻足，并对唐人街开始产生兴趣的是一个老头。

那天，我站在Beach街与Harrison交界处——这里可以说是唐人街的中心，前后左右把整个唐人街扫视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对自己说，可以走了。正打算离开，突然听到一个人说话：“哎，买一块玉，正宗的缅甸玉！”

我低头一看，原来我站在一个小地摊前面，摊主是一位看上去绝不会小于六十的老头，在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上面摆了几十块缅甸玉，上面一个硬纸壳，写着“正宗缅甸玉，29美金一块，如假包换”。我所有的玉知识都来源于国内产玉与不产玉的旅游景点中都有的卖的、档次不一的地摊，我掂量着，这位老人的地摊若是在国内，旅游景点的级别是够不上了，有城管出没的地方估计也够呛，突然，我发现这个老头的玉摊竟然超出了我的地摊知识领域，不禁蹲了下去，仔细看了看，没错，这位老爷子似乎在做姜太公钓鱼之类的事情。

“买一个，如假包换，又不贵！”老人见我蹲下，连忙招呼。

我赶紧站起来，正色说：“贵，29美金可是很多钱！”

“哎，你是哪来的？”老人转换话题。

“我？上海。”我有些迟疑地回答。

“你一个人？没有导游？”

“嗯，一个人。”我说。

“你来干什么？”老头又问。

“玩呀。”我说。

“天啊，你怎么拿到签证的？你知道别人花好几万美金都要来美国，我说你，干脆别走了留在美国……”老头突然很起劲。

“我为什么要留在美国？上海挺好的。”我说。

“哎，对哦，上海好像很有钱，你要么带一块玉回去吧，前几天，一个上海人就在我这买了好几块，我天天在这里，看到许多上海人，都有钱的不得了……”

“哈哈，上海是很有钱，不过我例外。”我打断老人的话，扭头要走。

“等等，我问你，上海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世博之家？”老人突然拦着我。

“世博之家？”我摇摇头，说：“没听说，就是世博园吧？”

“不是不是，就是世博之家，电视上不是说了吗？你是上海人难道不知道吗？”老头略带尖酸地逼问道。

“不知道，不感兴趣。”我说。

“那你去过世博没有？”老头问。

“去了，去了三次。”我说。

“三次？”

“是呀，亲戚朋友来了，不能不带他们去，我都可以当导游了！”我苦笑。

“啊呀，我说的就是这个。把家弄成临时旅馆，一百块钱一个晚上！”老头几乎叫了起来。不过，相对我的叫声温和多了，我几乎是尖叫：“哪里？！怎么可能要钱，都是亲戚朋友的！”

“那你可以收我的钱，我给你100一个晚上，我去上海住你家里！”老头说。

“不可能！”我几近粗暴地拒绝了这个老头，一扭头大踏步赶紧走了。X，说实话，这位老头已经开始让我感觉到一种悲哀了。我很奇怪，不说话时，这个老头几乎与我老家乡镇农贸市场抱着自家老母鸡出来卖鸡蛋的老头一个模样，甚至连身上的衣服都有可能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温州，可是一开口说话，总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见多识广的优越感时不时从他那猥琐的躯体和奇怪的口音中泄露出来，旋即又鬼头鬼脑地缩了进去。我想，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唐人街幽闭恐惧症呢？顿时，一种悲哀涌上心头，夕阳残照在Beach Street街头的中国牌坊上，暮色中的唐人街啊，还是忘了吧！

2

我是从华裔作家伍慧明的小说《骨》中知道“唐人街幽闭恐惧症”这个名词的。《骨》中，作为旧金山唐人街第一代移民，梁家父亲常年在外出海谋生、母亲没日没夜在制衣厂工作，唐人街对于他们梁家人来说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牢，一个暗无天日的洞穴，以及不可实现的美国梦、长年累月的劳作、谎言与失败等悲惨记忆。X，或许凭几分钟的交谈，我就给我遇见的这个唐人街老头戴上这么大一顶帽子，未免太过于主观，但我想起赛珍珠说的一句话：“唐人街是两个世界的盲点。”或许，波士顿唐人街也如此，它的故事并不会比旧金山唐人街、纽约唐人街逊色，只是既不为美国世界所知，也不为中国世界所知

而已。我对波士顿唐人街的兴趣就是这样突然气势磅礴地喷涌而出，此后，若是有人问我为啥一个人跑到波士顿了，我就忍不住得意洋洋地高声宣布我此行的宏伟目标——我要打开两个世界的盲点！我想知道唐人街里的秘密！

幸亏，我偷得浮生半年闲，闲着无事，于是几乎日日去逛唐人街。波士顿的唐人街据说是排名旧金山唐人街、纽约唐人街之后的第三大唐人街，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这么告诉我，但我依然不敢相信，因为它实在太小了。后来在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的一份白纸黑字的资料上看到介绍说是第五大唐人街，我依然不敢相信，因为它实在太小了，用一句形容老银川的话说就是一根香烟走到头吧。

后来，我在纽英伦历史协会那里拿到一份波士顿唐人街的黄页，上面说，波士顿唐人街大抵以Beach Street、Harrison Avenue、Tyler Street、Essex Street为中心，占地大约五亩，然而在这五亩地上，从餐馆、点心铺、食品加工厂到超市、珠宝店、音像店、五金店、百货店、礼品店、布庄、鲜花店、家具厨具店、眼镜店、电信，再到华人教堂、中文学校钢琴学校英文补习班以及驾校、美容美发店、中医西医牙医、报馆、殡仪馆、武术馆、旅行社、建筑公司，再到保险公司、银行、律师楼、会计所、房产中介，以及五花八门的各种协会组织，竟有三百余家，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几乎在这五亩地里可以与外面的世界一样精彩地完成。这让我第一反应是难道我两个月来日

日转悠的地方不是唐人街？

且不说那我自负肯定不能逃出我法眼而偏偏逃出我法眼的六家中文报馆、八个功夫馆、六家中文书店，更不提四十多家稀奇古怪的协会组织、三十多家美容美发中心，但名单上列出的四十多家餐馆、七八个点心店就让我狮子般的雄心顿时变得像老鼠胆子般大，要知道那会儿我自信自己已经将唐人街上的菠萝包吃出了一个排名榜，也可以根据财力与心情找一个中餐馆吃饭，谁知一看小册子，竟然有一大半的店铺连名字都没看过，岂不笑话？

痛定思痛，自此，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几乎日日拿着这本唐人街华埠主街（Chinatown main street）的黄页小册子按图索骥，于是，五亩地的唐人街如充气般膨胀立体起来，变得遥远深邃、神秘莫测。

X，你知道吗？如今波士顿唐人街所在位置，最早是一个浅水海湾，1806年到1943年才被填为陆地，第一批主人多为中产阶级的白人。1850年，南火车站以及铁路的修通，让这片地区变得嘈杂混乱，于是这里逐渐变成了皮革成衣工厂的大本营，自此，一批又一批新移民们不断搬进来，在此度过一段艰难岁月后又一批一批搬出去。起初是爱尔兰人，接着是中欧的犹太人、意大利人和叙利亚人，他们逗留的时间不长，到1900年就只剩下叙利亚人。那时，华侨还大多住在狭窄没有阳光的小巷中——Oxford Street和Harrison Avenue一带，待最后的叙

利亚人也搬走后，这里才全部成为华侨的地盘。如今，Oxford Street依然深藏在唐人街中心，这个阴暗狭窄、凹凸不平的小巷子，仿若沉睡在过去的昏暗岁月中，外边的沧海桑田似乎与它无关。唐人街上历史最长的两家公司上海印务公司与新新果蔬公司，至今依然在这个小巷子中。

实际上，从这个巷口只要走上不到百步，便可以站在修建于1982年的唐人街标志性建筑中国牌坊下，在牌坊前面便是一条高速公路，几乎将唐人街拦腰斩断。这要“归功”于我曾和你说过的美国五六十年代在各个城市兴起的城市更新计划，其实，当时的波士顿也未能免于潮流，当时的中央干道的兴建被视为是波士顿城市更新计划的一个重大工程，从1951至1959年份三期进行。几十年后当年唐人街的老居民李同利回忆说：“当年的波士顿正陷入经济萧条，工业一蹶不振。大兴土木、建路兴桥，愿意为刺激经济，促进生产。公路工程师视察华埠及毗邻的皮革区、制衣区一带暮气沉沉，华埠更像个贫民窟。也许他们想拆去萧条的建筑，重建一些更有生气的事业。”为了修建现在这条富有生气的中央干道，当时刚刚落成五年，不但是当时社区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华埠象征的安良工商会大楼被迫拆去三分之一。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反抗谈判行动，公路工程作出了让步，清拆当时整条Hudson Street的计划改为只清拆Kneeland Avenue以南的东半边街，因此至今从Kneeland Avenue

到Marginal Road一段是一道高高的护土墙，将剩下的西半边街的楼宇孤立隔绝起来，被割去三分之一的安良大楼今天已改造为丽晶大酒楼。这或许是我在波士顿看到的最为不和谐的地方吧：一道川流不息的现代高速公路犹如一把时光利刃，将与世隔绝失去时空的唐人街强行拉出一道口子，福兮？祸兮？我不知道，只是每次走过中国牌坊，到对面的中国超市买东西时，横穿这条马路时，唐人街中的懒散与混沌都会立即收敛起来，警觉地左看右看，等待着对面的绿灯放行，走到另一半唐人街。

在Tyler Steet 90号，我看到了那栋破旧的三层红砖大楼，这便是鼎鼎有名的昆西学校(The Quincy School)旧址所在地。这所学校成立于1847年，以波士顿第二任市长Josiah Quincy名字命名，这是美国第一所按年级分班，并给每一个学生提供独立座位的学校。学校成立之初，几乎没有华裔学生，大部分学生是叙利亚人；1940年代，华裔学生大约占了20%；到了1960年代初，华裔学生取代叙利亚学生，成为昆西学校中人数最多的族裔。学校大楼最初四层，1938年一场可怕的飓风将大楼第四层的尖顶刮走了，1970年市政府重新修建了新的校舍，将学校从唐人街内的Tyler Steet 90迁至与唐人街毗邻的Washington Street 888号，1976年，将昆西学校旧址以一美金的象征性价格卖给纽英伦中华公所，以服务于唐人街社区。徜徉在这座旧楼边，当年的学校

操场已经变成了停车场，我无法想象第一个中国孩子迈进这所学校的样子，不过，在一份资料上，我看到了几幅昆西学校的历史照片，其中两幅分别是1942年与1950年代的学生集体照片，不同肤色孩子们整齐地排排坐在一起。还有一幅摄于1946年的照片，是两位五岁与六岁、身穿中国刺绣绸缎衣服的小女孩，一起在认真看一本英文儿童书FLIP。这让我想起作家张翎在谈起其小说《金山》时所说的：“在翻阅史料的某一天里，我撞到了一句话：‘几十年里难以攻克的种族壁垒，最初的一丝松动并不是发生在政客的谈判桌上，而是发生在学校的操场上，当两个不同肤色的孩子为抢一个球而发生肢体碰触的时候。’这句话电闪雷鸣般地在我沉涩的思路中开辟了一条蹊径，让我看到了一小群从前没有注意到的人。”

X，就这样我在唐人街走了一个多月，发现的故事越来越多，五亩地的唐人街越走越大，每走一步便能找出一个故事来。比如，Harrison Avenue 38号半那栋楼房，其前身是波士顿最早的一家中国餐厅杏花楼。门口的台阶仍然有“杏花楼，1879年建”的字样，二楼的当时在中国也极为盛行的铁花露台依然面对着大街。这种中国风格的雕花阳台，正是当时颇为时髦的阳台茶座。在Tyler Street 和Hudson Street上也能看到这种阳台茶座的痕迹。又如在Beach Street和Tyler Street的转角处的墙上，我看到一块Phillis Wheatley纪念

碑，殖民时期贩卖奴隶的船只正是在这里登陆，其中便有Phillis Wheatley。在波士顿老南会议厅（old south meeting house）中，进门第一个塑像便是这位女诗人——1773年她的诗集在伦敦出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作家。

X，你知道吗？到最后，当我走在Beach Street上，我会想象六七十年前横空架在这上面的高架铁路，悬空的火车在头顶轰隆轰隆而过的景象；从兴盛糕点铺或是包包亭西饼屋里咬着菠萝包出来时，我仿若会看到百余年前嘴馋的孩子在这里追逐着叙利亚面包的味道；每次在唐人街的餐馆吃饭时，我很想告诉同桌吃饭的人，在七八十年前，这里最时兴的不是广东菜，而是“杂碎”——一道典型的美国中国菜；看见路边的中文餐馆招牌，我会想起杏花楼1931年打出的有着几分旧上海电影画报气息的美女广告招贴；路过唐人街路边的蔬菜水果摊时，我会想起一个世纪前，在这里开垦中国农场种植蔬菜水果以供应唐人街餐馆的那些遗落在历史中的人……x，第一次我发现时间与空间竟然可以完全脱节，时间一层一层凝固在唐人街的每一个角落，于是空间变得像俄罗斯套娃，时空如转动的魔方似的不断转动，我身处何处，我开始有些晕眩了，张爱玲所说的一种罔罔的人生威胁从模糊而又遥远的历史苍凉之处袭来，伤感没必要放大，但足够让我一个人怆然而泪下，于是我对自己说，忘了它吧，这是唐人街。

3

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学家。

X，这是我在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第一期捷迅上看到的一句话，在这句话后面，他们写到：“所谓历史，终究不过是个人与团体的回忆、经验以及他们所编织成的故事。”对此，我非常幸运自己找到了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这么一位出色地会讲故事的唐人街“导游”。

一天，我在中国超市买完东西，顺手在超市出口处拿了一份免费报纸《舢舨》，回到住所细细看，发现这是一份非常有趣的报纸。

《舢舨》的英文名字叫SAMPAN，我猜想这是广东台山话音译英文名，在唐人街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英文，比如点心叫“dim sum”，杏花楼叫“Hong Far Low”，“至孝笃亲”为“Gee How Oak Tin”（这个英文翻译至少让我琢磨了不下半个小时，后来还是珊姐用广东话念一遍我才恍然大悟，但我还是不知道那四个汉字怎么变成这个洋模样的。）x，从这个颇带广东气息的中英文名字，我想你大概能猜出这份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吧。没错，其实它或许就可以说是波士顿唐人街报纸，创办于1972年，起初它是一份月报，自1984年改为周报，成为新英格兰地区唯一的中英文双语周报，不过，确切地说应该是英中文双语周报，报纸首先使用的是英文，其次才是中文。

正是在那份2010年12月3日的《舢舨》上，我看到了望合墓园的消息，知道了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这让五亩地的唐

人街顿时又膨胀了百万倍。

在波士顿城区的一所公墓中存有一块这样的碑文：“安葬此地的是19岁的中国少年阿周，他于1778年9月11日在波士顿号船上从桅杆堕下身亡。他的雇主约翰波立此碑以志纪念。”这是现在能追溯到的中国人在波士顿最早的足迹，也是唯一的线索。

1869年，美国人在庆祝完其横跨东西两岸的铁路通车后，“毕竟他们曾经建造过万里长城”的中国劳工受到排斥，出台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排华法案，中国人甚至不能靠近当时那里发现的金矿，于是便渐渐东迁。1870年，第一批中国劳工75名来到麻省西北部的北亚当斯（North Adams）镇，受雇于当时一家著名的制鞋工厂山普森鞋厂（C.T.Sampson's factory）。当时，工厂工人正在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老板山

普森不甘示弱，于是便去加州招了75名华工，并签订了三年合同，合同写明第一年每月工资23元，后面两年26元，但衣食自理，住宿费从工资扣。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说，这些华工不到几天便学会了制鞋的每一个步骤，且生产速度极快，他们每周生产120箱，比工会工人多十箱，因此每周成本可降低四百元。可以说，山普森试用华工相当成功，第二年虽然当时反对雇佣华工的呼声也出现在美国东部，但他又招了50名。据说，这些勤勉努力安分守己的鞋工还颇受好评，有妇女主动教他们英文，有教会邀请他们去做礼拜，甚至连工会的鞋工都赞扬他们：“没有一个国家的人，能像这些中国人一样，一百多人住在一起而不饮酒闹事。”

不过，三年后合同期满，由于制鞋厂进一步机械化，一部分工人失业了，他们有的回国，有的去了别的州，有的便来到



了波士顿。当时波士顿的电话公司大兴土木铺设电话线雇佣了一批华工，除了鞋厂工人外，还有从西部乘横贯铁路而来的华工，他们在南火车站下车，就地搭了帐篷，把栖身的这个小巷子取名叫“平安巷”（Ping On Alley），这就是今天唐人街的所在地。如今当然找不到帐篷的痕迹了，我甚至在那巴掌大的唐人街找了许多遍，都没有找到这条叫“Ping On Alley”的巷子。这让我至今想起还懊恼不已。

据一位地理学教授统计，1890年左右在波士顿的华人大约200人，1900年大约500人，1910年约900人，因移民法的限制，女性极少，1905年全波士顿只有15位中国妇女，而男性约有800，到1940年，1792名华人中只有70名女性，可见，早期波士顿唐人街与旧金山等地的唐人街一样，是一个典型的“单身汉”社会，与绝大多数早期移民一样，他们没有家人，去世后大多安葬于此。在早期美国华人社区中，常有“粤人重洗骨葬，定期捡执遗骸，运回原籍安葬，以免孤魂靡托，旅骨无归”，这与广东地区“拾骨重葬”的民俗有关。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内战，运送棺木的习俗中断，这些孤魂旅骨便从此长眠于波士顿郊外的望合山上（Mount Hope）。

由于没有后人祭祀，这些坟墓很快成为荒冢，为了保存这段历史，1992年，唐人街内部组织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CHSN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ew England）成立之

后，开始了这段历史的保存、还原工作。2007年3月，经过CHSNE和志愿义工的努力，花费18万美金，终于把埋葬在这里的超过一千五百名的华人移民的墓地修复完毕，并建立了一个电子资料数据库和一座“望合墓园华人移民纪念碑”（Chinese Immigrant Memorial at Mount Hope），让这里成为大波士顿地区纪念、凭吊早期华人移民的重要历史场所。

在看到有关望合墓园报道后的第二天，我早早爬起坐上橙线地铁，到达终点站Forest Hill 后又转公交车，在望合山下下了车，然而我却迷路了。Google地图搜索告诉我，我下车后只需走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望合墓园，然而我几乎绕着望合山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望合墓园，再然而，一条叫哈佛（Harvard）的公路又将望合墓园从中劈开，一分为二，于是在波士顿寒冷的初冬阳光下，我在两个望合山头林立的墓碑中找了半个上午，最后在饥寒交迫中无功而返。一天后，坐在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的办公室里，Nancy告诉我，以那条哈佛马路为界，望合墓园分公共墓园与私人墓园，华人移民纪念碑在望合墓园公墓中的华人坟墓地带（那是当时墓地种族隔离地带），若是没有人带领，没有驾车，要找到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X，Nancy就是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现任行政主任。这个协会是1990年由当时唐人街内店龄第二长的果蔬市场新新公司东主黄绍英倡议组成的，1992年

夏，正式在麻省州政府立案，成为纽英伦地区第一个以“采集、维护及发扬纽英伦地区华人移民史迹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任务是“要为华人在纽英伦大小城镇史志内争回应有的一席之地，并且促进跨越文化界线的相互了解及尊重。”1993秋，协会在波士顿重建局所拥有的中华贸易中心（Boylston Building）内，争取到一间免租约的临时办公室，办公室每周二三四与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开放，我正是在一个周二的上午来到办公室见到Nancy的。Nancy的父母在广东台山出生，移民到纽约州的Poughkeepsie市，在那里经营一家洗衣店三十多年。Nancy在哈佛大学毕业，获得社会学学士，之后又获得管理规划及社会政策硕士，如今她和她的丈夫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住在Brookline小镇。可以说Nancy的家是一个典型的早期华人移民家庭，作为移民第二代，她不会说汉语（或许会说一些广东话），因此，我们的交谈也只限于表层了，这让我大有悔不当初没有好好学习英语之心。

幸亏，有文字与资料。更幸亏，有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

若按性质，这个协会只不过是一个民间组织，甚至只是一个完全靠义工与捐助运转的协会，然而协会严谨的态度与实干的精神，可以让一些出身名门正派财力雄厚的学术机构脸红。如在2003年的协会年度报告中，其中一项成绩便是“动用一千小时的义工完成了183个指标牌的移民档案资料纪录，该档案收集了

从1911年至1955年的移民资料，共有两万个资料夹”。又如自2010年，协会将望合墓园中的墓地记录如墓主姓名、墓地确切位置与每一个墓碑的数码照片结合起来，并将墓碑上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建立了一个可搜索的数据库。



自成立之初到现在,这个协会一直坚持进行“华埠史迹行及多媒体史库”、“从华埠到城中区”史料、“透过照片保存历史”以及对历史资料简报日常物品的收集等资料库的建设,还举行了Tyler Street故事展、Hudson Street原居民团圆会、妇女先驱展、“祖母的八宝箱”等活动,出版了《1870-1965在波士顿的中国人》《麻州华人经历与贡献》《波士顿唐人街历史》等图文集和DVD出版与制作等。而协会每年一期的《纽英伦华史捷讯》,可以说是我读到最有生活气息的历史刊物:既有专业的历史教授写波士顿与杂碎的历史,也有普通居民对儿时生活与叙利亚邻居的回忆;既有对清末官派留学生足迹的追寻,也有对早期移民踪迹的寻找;既有对中餐馆以及中国菜演变历史的追溯,也有对首批在本地种植果蔬的移民的介绍;既有对取得斐然成就的杰出华人颁发的“游子奖”,也有对青年学生鼓励的各种奖学金……薄薄十几页或是二十几页,中英两种文字,无非关乎当时唐人街中华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却让我再次跌进唐人街的历史迷宫,头晕目眩。

其中最让我好奇的是协会与哈佛慧琪利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图书馆一起主持的“华美妇女口述历史计划”,专门记录1965年移民法案改革之前、居住于纽英伦地区三十岁以上的华裔妇女的故事,包括移美之前在中国的生活、移民的经过、家庭工作状况、在美适应、文化认同等各放慢的体验与遭

遇,以真实反映当年妇女地位及社会状况。在1997年的《纽英伦华史捷讯》中,我看到了口述计划即将造访的十一位妇女名单及简单介绍,既有目前为纽英伦地区职位最高的亚裔政府人员、公共图书馆馆长、植物学家、艺术家,也有普通的家庭主妇、在洗衣店女工、餐馆老板等。当我得知这个计划在招募志愿者义工时,我立即激情澎湃地向Nancy提出申请,Nancy却为难地向我摇了摇头。无需多说,我表示理解,点了点头——且不说我的签证没有给我足够的时间,单就是广东话便把我拒之门外。

于是,我只好对自己耸耸肩说,忘了它吧,这是唐人街!

4

X,你知道吗?在波士顿的最后一个月,我不再有事没事在唐人街上胡乱逛游了,而是坐在至孝笃亲公所喝着咖啡,听那里的老唐人街们讲故事了。

知道至孝笃亲公所,依然是在纽英伦历史协会的那本华埠主街的黄页小册子上,在那本小册子上,我还发现了十几个这样的组织,如洪门致公堂、中华公所、阮氏公所、李氏公所、梅氏公所、黄氏宗亲会等等,这让我对唐人街的兴趣再次高涨,几乎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了,因为作为一个金庸迷和韦小宝粉丝,我恰巧知道所谓洪门乃是天地会对内称呼,洪门致公堂正是天地会散落在海外的组织,也是早期华人移民名目繁多的帮会组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会员几乎占了

当时全美华侨的十之七八。孙中山当年为了闹革命，便曾在1911年提议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并在《大同日报》《少年中国晨报》刊登联合布告，并设立洪门筹响局为革命筹集捐款。于是乎，有那么几天，我天天念着“地振高甍，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兴冲冲地跑到Tyler Steet 6号楼二楼按洪门致公堂的门铃，期冀能在21世纪的现代都市中看到韦小宝式的堂会香主的模样：香案两边分列太师椅，烛台香炉后供奉少林祖师，一群稀奇古怪之人义结兄弟喝血盟誓豪气冲天……

X，我知道我又将小说与生活混淆了，其实，在连续吃了几天的闭门羹后，我的豪气渐渐没了，幸亏在按完洪门致公堂门铃后，我总是会接着去按隔一条街的至孝笃亲公所的门铃。与洪门致公堂铁将军把门不同的是，至孝笃亲公所每天都有专人在那里上班，珊姐就是其中一个。于是乎，我便隔三岔五地去珊姐那里混一杯咖啡喝，看看当地报纸杂志，听听老唐人街人唠嗑。

原来至孝笃亲公所是陈、袁、胡三家姓联合的宗亲会所，与绝大多数其他姓氏宗亲会所一样，其历史也可追溯到百余年前排华时期。那个时期，排华令几乎剥夺了华人的一切权利，华人聚集在唐人街内几乎与外界隔绝，于是，在内部逐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自卫自治组织，“解决工作、营业、债务、纠纷、新侨的安顿、旧侨的归里等问题”，如各种宗亲会、同乡会，至孝笃亲公所至今似乎依然起着这

种作用，每年逢年过节公所都会举行各种活动，比如吃汤圆吃粽子，与其他地方的至孝笃亲公所不定期举行恳亲大会。不过，当时更引人注意的是带有黑帮性质的堂会组织，如现在的安良工商会早期就是一个堂会组织，还比如当时的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发展为潮汕地区的三合会又成为海外最大帮会组织的洪门致公堂。这些堂会组织当然不可能去美国政府处立案，赌场、鸦片馆、妓院成为他们的经济来源，各个堂会之间为了利益，抢地盘进行械斗，即便是在波士顿这个比较温和的地方，1903年就因协胜堂与安良堂之间发生械斗，一位协胜堂的人被杀，结果波士顿的警察与移民局联合包围了唐人街，258名华侨被铺下狱，15人被驱逐出境。这几乎是占了当时波士顿华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台湾历史学家孙隆基对此说：“海外华人扩散群的这个情况，确实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型态，即市民社会无法成形，应付压在头上的专制政权的对策是不理会它、自己暗中另搞一套。此倾向仍持续于现代西方社会，乃因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出于自卫的需要。”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今在波士顿街头，唐人街亦成为寻常巷陌，俨然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有许多次，我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外”来此观光猎奇，或是在南北风味馆子外排队，或是手拿一个从桃园饼店买的麻团，边走边吃，还一边听着导游的介绍。当年这些堂会早已不知所踪，各种宗亲会、同

乡会、校友会在我看来有些像老年活动室的味道了。一天，我偶然走进一幢红砖大楼的地下一层，这让我第一次有回到中国的感觉，因为在那里我竟然发现有一个麻将馆，有四五桌老头们正在切磋国粹。我推门而进长驱直入，在里面东张西望近十分钟，几乎都没有一个人抬眼看我，乃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小心披上了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这让我开始怀念第一次来唐人街遇见那位老头。奇怪的是，自从那次之后，我竟然再也没有见过他。最后，我在另一个相连的单元房里，自己倒了一杯茶，看了看报纸和杂志，便自觉告退了。在社会学上，英文用“Inner City”来指美国贫困黑人区，我想，这是不是也是一个“Inner City”

呢？他们的世界，外人永远走不进去。我告诉自己说，忘了它吧，这是唐人街。

X，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我又去了望合墓园。这一次我没有迷路，反而在望合墓园遇见了墓园工作人员Richard，他从墓园门口开车带我去中国墓区。然而，我依然什么也没看见，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暴风雪早将当年那些简陋矮小的墓碑埋没，甚至连墓园中的道路也难以车行。Richard只好带着我弃车步行。走在没过膝盖的积雪中，远远看着华人纪念碑上“慎终追远”四个字，我突然有一种走出迷宫、重见天日的感觉，天地无限宽广，我将无限美好。

X，我知道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你。Q

我们的大学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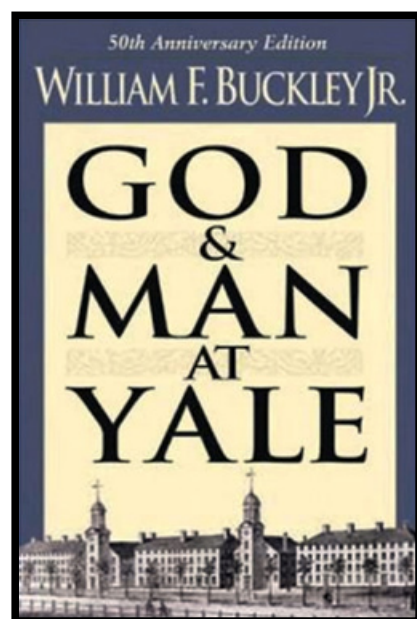
——关于高等教育的病态

作者 James Piereson

译者 朱芳艺 (fangyizhu@gmail.com)

今年秋季，1900万学生即将进入4000所左右具有学位授予权的美国学院或者大学。大学的招生每年都稳定增长，自从1970年以来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而对比2000年，也增长了将近三分之一。超过70%的高中毕业生进入社区大学、四年制寄宿学院、或者那种新型的网上大学，然而这些学生只有将近一半左右能够在五年内毕业。招生的持续增长来自这样一种普遍的信念（为大学行政人员所鼓励）：要想进入中产阶级的世界，大学学位是必须的。大学教育现在被视为一种奖赏，它只要对一些人有好处，那么就对所有人都好，即使没有一个学术界的权威人士能够界定这样一种教育到底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这些概念是高等教育民主革命的中心思想。

高等教育就这样成为很多国外人士（现在基本都是亚洲人）所乐意支持的“成长中的”少数美国工业之一。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大学学杂费的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的五倍，迫使家长和学生为了这些日益增长的费用而深陷债务。由于长期牛市，学院及大学收到的捐赠自80年代中期以来爆炸式增长，为工资、新雇人员、财政资助、新大楼和新课程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少数名牌学院和大学，



主要是私立的，每年都收到极多的来自高中毕业班学生的申请，希望能够给他们检票通过，从而进入美国社会的上层。但是这些精英学府远远不是整个高等教育的代表。绝大多数的学院和大学——至少90%以上——接收任何持有高中文凭并能够付钱的申请者。考虑到财政资助的存在，任何高中毕业生只要想上大学，就可以上。

很多大学，以及不少学院已经名列财富500强，他们拥有高薪的层层行政人员，其

下管理着一个复杂的王国，有半职业的运动队、医学院、商学院，以及昂贵的研究机构，还有传统的科系，负责给本科生提供课程。就像其他工业一样，高等教育有它自己的杂志和报纸，在华盛顿有他们的富有影响力的说客，还有付费广告机构来提醒大众他们的事业对国家利益是多么重要。公司的成员们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总体目标，而与此相比，学院和大学则很难界定他们的事业是为了什么。大学教育是什么？在随便哪个校园，随便什么时候，你都能看到教授们在热烈争论着，关于大学教育需要什么，而他们的学校的使命又该是什么。很少有什么行业敢于拿出一个昂贵产品，却无法回答消费者的质询，说出它到底是什么。然而，这就是大学至少从1960年开始就一直在做的事，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一直做得很成功。

对于高等教育这些发展趋势的最尖锐的批评主要来自政治上的保守派。自从William F. Buckley Jr.于1951年出版了《耶鲁的上帝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保守主义者就成为主要的批评者，认为大学偏离了它们作为文明的监护人的传统角色，而渐渐形成了政治化兼工业化的学府。几十年来，保守主义者诸如Russell Kirk, Allan Bloom, 和Roger Kimball等人批评过大学把核心课程分割得支离破碎，提供些时髦但是没有智力价值的课程，向政治正确投降，以及牺牲辛苦工作的学生和家长为代价，来给教授们提供轻松的挂名差事。保守主义者一贯对高等教育的民主化运动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必将导致标准的降低和目标的丧失。很多事情证实了他们的预言，虽然他们的诊断对于改变美国大学的发展路线收效甚微。

自由派在批评高等教育上一直比较含蓄，无疑这是因为他们（相比保守派）几十年来一直掌管着这一行业。就他们所呼吁的高等教育改革而言，通常就是敦促学院和大学在它们正在走的道路上走得更快一些——也就是说，更多样性，更多人可以享受，学生在课程上有更多选择，针对特殊群体的更多课程，诸如此类。因为他们是在学术界的墙内操作，自由派（以及左派）在把他们的提案变成学术政策的问题上，从未感到过如此多的困难。

然而，在针对高等教育的日益扩大的评论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很多过去由保守主义者提出的批评，现在正在被自由派重复提起，或至少是那些跟保守主义思想和组织毫不沾边的作者们。至少两位杰出的学术领袖，Anthony Kronman，耶鲁法学院前主任，和Harry Lewis，哈佛大学前训导主任，出版了对大学和学院的严厉批评，说它们未能以过去人文学科里面曾经有过的重要道德和政治问题来挑战学生。现在出现了好几本书，从自由派的观点出发，从不同角度责备学院和大学：它们太贵；它们提供的教育不够水准，特别是考虑到其价格；它们的管理头重脚轻；它们的教员太专业化；它们不重视教学；它们的手册充满了古怪的课程；而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提供学生们需要而且理应得到的人文学科的教育。这些都

是很严肃的指控，特别是考虑到这些指控是谁提出的。这些问题后面是什么原因？而这些作者们又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Andrew Hacker和Claudia Dreifus在他们的新书里面阐述了最完备的指控，书名叫《高等教育：大学是怎么浪费钱财并辜负我们的孩子的，而我们对此能做些什么》。

1 这些作者可不能说是这一行业的门外汉或者对他们的对象不熟悉。Hacker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著有很多学术书籍，从前是康奈尔大学教授，现在是纽约皇后学院的退休教授。Dreifus为纽约《时代》杂志科学版撰写文章，她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对于高等教育的广泛批评居然来自这些有着无懈可击的资历的学者，看到这些，真是让人感到惊讶，甚至耳目一新。然而我们不能把这称作是平衡或者公平的批评。它意在激起愤怒，并对它所诊断出的毛病提出治疗措施。而与此同时，这本书也提出了很多有用的观点，并基本都有事实和例证来支持。

Hacker和Dreifus从这么一个假设开始：高等教育已经丧失了它的内在方向，并再也不能履行它对美国新一代的基本义务。正如他们所写，“我们社会的一个巨大的一一且至关重要的一一部分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扮演很多角色，但没有一个做得好的。”高等教育的中心目的是提供教育把学生变成“有思想和有趣的人类”，这是人文学科教育的公认目标。学院和大学已经被许多次要性的活动搞得疲惫不

堪，从科研到大学体育，它们已经忘记了最基本的使命。

作者站在一个较古老的——或者是60年代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立场来写作，假定民主的教育和人文学科应该协同运作。因此，他们断言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学习，而大学教育应该对所有人开放，这样的教育应该围绕着人文学科，从比较宽松的定义上来说是如此。然而，在1960年代，民主与平等的主张被歪曲成了这样一个关于多样性的教条，认为人文学科没有真理可以教，而这样一来，大学就没有权利将任何课程强加于他们的教师和学生。作者们似乎认为，这一古老的复合体可以在如今的校园复活，只要一些污垢诸如学术研究、管理臃肿、大学体育这些能够被清理掉。尽管关于这个他们无疑是错了（问题其实在更深层），他们的书仍然含有很多有价值的观察，说明在高等教育界，的确是有些什么已经朽坏了。

高等教育含有一个基本矛盾：学生入学是为了接受教育，但是教授们却根据他们的与教学无关的学术研究来得到工资和升职。其实，在作者的观点中，“在良好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之间，有一个负相关的关系。”对科研的异常看重显然让教授们在教学上蒙混过关，把在其他学术机构的同行视为他们工作的更重要的听众，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学生们。这也鼓励教授们把学校的课程表塞满狭窄和深奥的课程，因为年轻教授“教他们的毕业论文”，而老教授们教他们最近的研究项目。这样，在各个学科当中的研究进展就

入侵了本科课程。终身教职政策，本来是为了保护教授们开展研究的自由的，现在使得他们在教室里面再也没有努力表现的那种干劲。同时，终身教职再也不是一个必要的保护措施，因为现在对于任何违背学术自由的行为，已经有了司法和契约上的解决方法。

还有，因为研究型的教授必须有研究生，所以每个主要的院系都必须有它自己的博士点，不论毕业生有没有一点找得到工作的希望。作者们引用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据：在2005年到2007年之间，美国大学总共授予了101,009个博士学位，但是在这些年里面，只有15,280个助理教授的职位开放。没几个研究生能有希望在他们本专业领域里面追求他们的职业生涯。很多这些多余的博士最终不得不去开出租车，或者开餐馆，但是其中也有很多被招回学校，作为兼职教员去教课，只得到终身教授们的几分之一工资。作者们估计，70%的大学教学是由兼职教员、研究生助教、以及其他非教职的人员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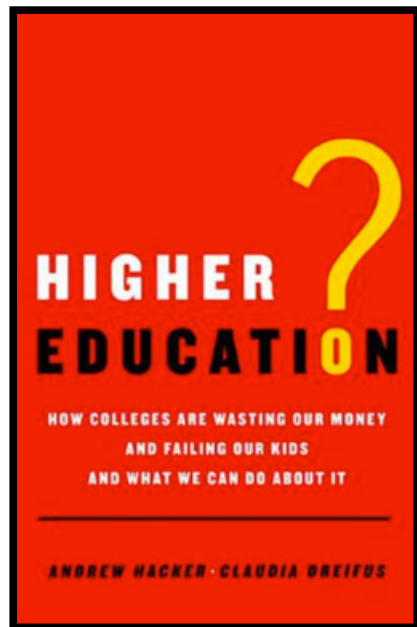
行政人员的扩增——行政臃肿——是高等教育费用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行政人员和学生的比例已经翻了一番。全国平均而言，每1000个学生有63个行政人员。在很多名牌学院和大学里，这个比例要更加高出很多。在威廉姆斯学院，70%的职位由教学以外人员占据。这还不包括运动场管理员、保洁工、食堂工作人员，而是诸如这些“婴儿看护协调员”，“配偶-伴侣职业咨询师”，以及“同性恋生

活协调员”（没错，这是一个真的职位）。在排名靠前的大学里，这是一个普遍的模式。

《高等教育年鉴》经常会有这类职位的广告，诸如可持续发展主管，证件专家，和专管学生成功的副校长。如果不去填这么些职位，而是雇佣更多的哲学家、古典学者和物理学家，学生们岂不是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么？

这些人浮于事的行政人员不仅是花钱（他们的工资都给得很慷慨），而且他们还能发明一些工作，需要更多的跟他们一样的人，这样就把学校的注意力从教学转移到了二级甚至三级的活动上。行政臃肿部分是学术机构日益增长的复杂功能决定的，也有部分是由于政府的要求。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新的行政人员是女权运动、环保运动以及同性恋研究之类的倡导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的扩张是现代校园政治化的产物。

行政人员占领高等教育的最明显的表



现就是“职业枪手”校长的出现，他们从一个学校跳到另一个学校，与此同时把他们自己及其同类的工资抬得越来越高。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从前在布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西弗吉尼亚大学的高层任职，现在他的工资超过200万。现今的大学校长拿到超过百万的工资一点也不稀奇，这些都是来自学生的学费和纳税人的补贴，而普通教授平均而言只拿到这个的十分之一。那么这些人真的是他们学校里的学术和知识的领袖，就像过去的大学校长（比如Robert Maynard Hutchins 和 Charles William Eliot）那样？大部分情况不是的。他们主要是被雇来筹钱、管理复杂的官僚系统，以及取悦他们的教员的。这类管理人员的出现反映了高等教育普遍地失去了知识上的目标。

Hacker和Dreifus把他们最强烈的批评留给了一小撮精英大学——被称为“黄金十二校”，它们（不合理地从它们自己的观点出发）为整个高等教育定调。这个名单很熟悉：八所常春藤，加上杜克、斯坦福、威廉姆斯和阿马斯特。它们是一切有野心的学生都想读的名牌大学，尽管他们当中只有极少一部分能有望拿到入学许可。大学里面这一类精英层的存在似乎违反了作者的民主公平意识。在他们看来，人们对这些学校的评价过高，它们配不上所拥有的神圣声誉。他们很尽责地举出了几所排名不那么高的学校（比如密西西比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们相信这些学校能更好地教育它们的学生。

尽管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真的，但作者们

没有为他们的结论提出足够的证据。他们没有试着去评价它们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如果这样会很有启发），而是，他们试图去评价其校友群体与别的学校毕业生相比的成功程度，这似乎与他们的书的主要前提相悖。他们的结论基于“黄金十二校”校友当中登上名人录的人数，与其他学校毕业生群体相比，并没有在生活中过得更好。不幸的是，当成功被用作一种考量的时候，他们也就承认了在一个学校中最重要的不是其提供的教育质量，而是它的毕业生在金钱、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成就。用这个标准，他们不大可能说服有野心的学生：如果他们去读本州的州立大学，而不是入读哈佛、耶鲁或斯坦福之类的，这样他们就会过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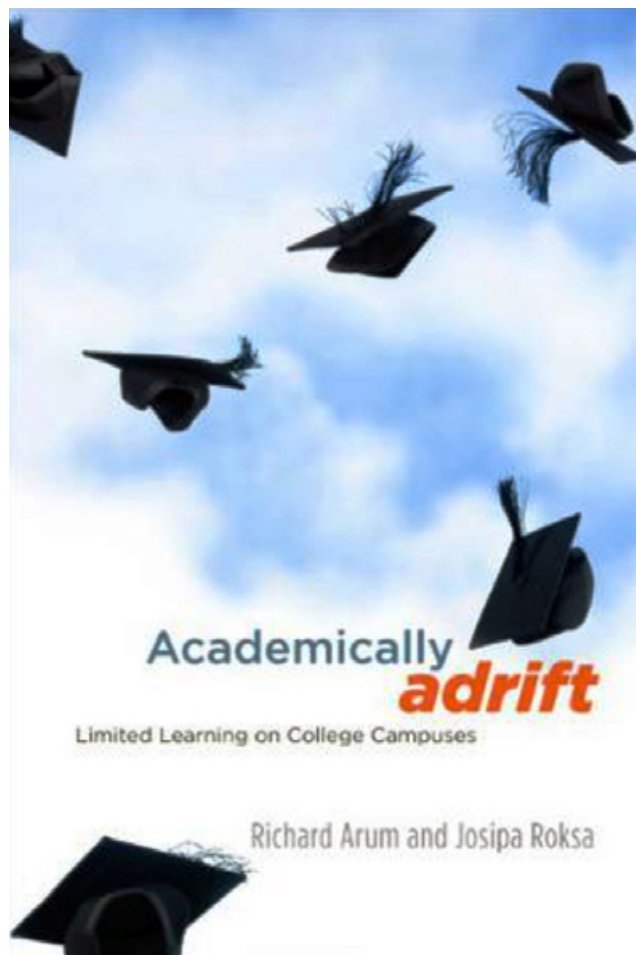
在校园里渐渐形成的知识真空当中，可以理解地，学生们在选择课程和专业的时候表达了他们的职业抱负。Hacker和Dreifus很失望，因为如此之多的学生选择了诸如商科、工程和传媒这些专业，而不是人文学科如历史、哲学和文学。在今天的本科生当中，商科绝对是首选，在受欢迎程度上远远超过了人文社科的传统领域。但是，谁能够为这样的选择责怪学生呢，尤其是他们再也不可能听到学校里有谁能够为人文学科提出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即将为一个学位花大量的钱，那么他们至少想要在毕业时找得到工作。

作者们阐述了几个有争议的解决办法，来降低高等教育的费用，并使之返回其中心目标。他们想要结束教授的终身教职和学术

休假制度,在本科教育的各个方面把教课的重要性放在研究之上,制止对兼职教授的剥削,甩掉大学医学院和科研系统,除掉大学体育,把资源分散到“黄金十二校”之外的更多学校,降低行政花费(特别是校长工资),探索新的技术来提高授课水平。这些基本算是好主意,尽管在当前情况下可能显得太乌托邦了。去掉大学体育,特别是足球,很久以来就是学术改革者的一项目标,他们今天离这个目标并没有比50年前或100年前更近一些。尽管如此,这些改革手段里面有一些,比如去除终身教职和缩减大学体育,可能由于大学里逐渐增加的财政压力而在将来变成现实。大学对兼职教师的剥削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如果要想让所有教学人员都有终身教职的话,它们是无法负担起这一费用的。因为费用上升而可用资源减少,所有学术机构都被迫面对“哪些课程它们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基本问题。鼓吹和批评所不能达到的目标,经济规则可能终究会将其促成。

Hacker和Dreifus的中心弱点是,他们从未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教育最可能造就“有思想和有趣的人类”,如果他们阐述一下的话,可能会十分有用。人文学科的教育是什么?学生们在本科时代应该学到些什么?每个大学是否都应该有一些人文学科的核心课程,如同一两代以前的那样?作者们为人文学科说话,但是没能告诉我们它们需要什么,或者它们怎么才能脱离现状并重现生机。

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是,今天的人文学科在大学里濒临死亡,这是由于专业化、多



样化和职业目标的共同影响。百年来,将科学模型应用于人文学科终于造成了Hacker和Dreifus所详细描述的这种后果。作者们所引用的学术歪曲现象都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造成的症状。这些后果当中的很多(比如不得要领的课程泛滥)都发生在人文院系,而不在自然科学院系,因为在后者仍然存在一个学习的阶梯,而科研跟正在进行的知识方面的探索是相关的。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特别是与全面失去目标相关的这类问题,都能够追根溯源到人文学科的崩溃上。

在这一过程中，暴露了在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一个巨大鸿沟，在前者，本科教学一般都不错（当资源充足时），而在后者，教学与研究都失去了目的，也就随之失去了它们的价值。保守主义者们早就知道了这个。在读《高等教育》杂志的时候，人们就可以感觉到现在有些自由主义者也开始有同感，并倾向于同一结论。

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中，近几十年来也出现了费用的指数增长，而学生学到的东西（以成就测试来衡量）却稳步减少。正如Hacker和Dreifus所详细描述的那样，1970年代以后，大学的费用也类似地提高了几倍。我们是否会在高等教育中找到与小学和中学相似的模式，即费用的飙升伴随着学习效果 and 学术活力的下降？

对于两位社会学家，Richard Arum和Josipa Roksa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他们在一本新书《漫无目的的学术：大学校园有限的学习》2（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里面陈述了他们的观点。Arum，纽约大学教授，和Roska，弗吉尼亚大学助理教授，他们的结论基于这样的实际数据，即相比上一代人，现在的大学生更不努力，写东西也少，学到的也少，而我们的外国竞争对手已经在成就和毕业率上面超越了我们。这样一来，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也就面临危险，这都得要拜谢我们的大学日益下降的标准。

目前衡量学生学习情况的活动始于

2006年来自Spellings委员会（以当时的美国教育部长Margaret Spelling命名）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向接受联邦资助的大学要求更多的“透明和可靠性”。这一报告要求“关于真实表现的更好数据”，以便学生、家长、和政策制定者用可以考察的效果来比较不同大学。委员会称，为了测量“国家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是否值得”，这样的考量是必须的。这个报告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在小学和中学已经使用很久的“效果测试”，也将引入高校。

在《漫无目的的学术》一书当中，Arum和Roska试着利用大学学习评估（College Learning Assessment, CLA）来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CLA是一个曾用于不同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身上的标准化测试，在入学的时候测一次，在第二年结束的时候测一次，最后在四年本科学习之后再测。CLA让学生考察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政治竞选的时候使用过的关于降低犯罪率的一个争论，然后写出他们对不同解决手段的评价，并给出他们自己的建议。这一测试旨在考量当学生刚进大学、两年和四年的课程学习之后的批判性思考、复杂的推理、以及把这二者写出来的能力。尽管《漫无目的的学术》这本书被社会科学的过多数据和方法论搞得沉重不堪，它还是一个严肃的尝试，去考察大学是否在实践它们的承诺去教育所有这些学生。这本书用拐弯抹角的方式，也就如何改善大学提出了几个有建设性的建议。

可以想见，作者们说，大量的学生在大

学几年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提高,表现在他们推理、分析和写作的能力上。根据他们的研究,45%的受试者在两年的大学生活之后、而36%的人在四年之后没有什么提高的迹象。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表现差异,在入学的时候已经很明显,而在大学期间变得更明显。作者们得出结论说:“一些学生经过了今天的高等教育,在一般技能方面并没有可测量的提高,而这些学生占的比例令人惊骇。”尽管如此,在毕业的时候,十个学生里面有九个说他们对他们的大学经历感到满意。

作者们把这些令人失望的结果归因于大学生活文化和大学课程的缺乏活力。学生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跟同伴社交而不是学习。学生生活的文化并未把学习和成绩看得很重要。他们的研究认为,学生们平均每周花13小时学习,比1960年代学生的平均学习时间少多了。而他们就这样也能过关,原因在于他们没有遇到什么课需要很多的写作或者大量的阅读,而这并不令人惊奇,既然我们都知道本科课程的现状。

Arum和Roksa在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方面与其他作者看法相同。大学的行政臃肿,有着一些好听的头衔,但没有一个要求提高学生的学术。兼职教授教了太多的课。教授们在教室里或者单独会见学生上花的时间不够。大学理事会和校长们全心想着全国排名和声誉。学生们被当作“顾客”,被给予了太多的选课的权利。大学在豪华宿舍、学生中心、昂贵的体育设施上花费了太多资源,这些举措都是不当的,只为娱乐和取悦学

生。很有意思的是,作者们呼吁学术界领导人普遍加强教育上的要求——就是说,它们的核心课程——以保证在他们的学校里所有学生都能受到基础教育。

他们没能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有太多正在上大学的学生,他们根本就没有积极性,也没有技能去应对大学课程。高等教育援助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Aid to Higher Education)的报告称,“40%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在阅读、写作或数学上都达不到大学入学水平,”这个跟Arum和Roksa所说的在本科期间没学到什么东西的数目很接近了。是否有可能我们把40%的我们的学生送进了大学,而他们对这些毫无准备并且也无法从中获益?教学和行政人员们是否让他们的课程“蠢起来”,以便这些学生能够过关?明智的观察者已经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尽管这些回答似乎违反了国家的承诺,即保证只要学生想要,就一定有大学可上。

《漫无目的的学术》在学术圈里遭到了广泛批评,因为(据说)大学学习评估(College Learning Assessment, CLA)并不真正考量学习情况,而更多地是能力或者类似的跟课堂教学无关的东西。也许如此(搞出这一测试的人并不同意),但是CLA的结果毫无疑问地与SAT和ACT考试的结果紧密相关,而行政人员正是依靠这些来决定谁可以入学,并认为是学习成绩的考量,而不是天生能力的考量。如果CLA没有用,那么批评者们就有义务给出一个更好的测试。

当然,也许根本想不出什么测试能够准

确地测出学生们应该在大学期间学些什么。高等教育的目的毕竟不是在推理和写作这样的基本技能上训练学生，而是招收已经拥有这些的学生，以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来给他们的教育作出补充——也就是说，知识和理解。将大学变成漂亮的高中，这跟把人文学科变成科学一样错误。在没有知识基础的时候，是不可能把一种叫做“批判性思维”的东西教给学生的。肯花精力去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学生，会自然地产生出批判和肯定的能力，也能够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人文学科的教育，如果正确地理解的话，是过去的教育者们用来让学生们从事追求知识和理解的手段。无论这一手段的弱点是什么，学术界领导者还没有找到它的有效替代品。

Mark C. Taylor的《校园危机：我们大学改革的大胆计划》3 (Crisis on Campus: A Bold Plan for Reforming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是2009年他在纽约时代报发表的客座文章的扩写版，他在那篇文章里呼吁废止终身教职制度，并取消永久性的学术院系，他认为这些都等同于过时的生产线和小型家庭农场。那篇文章的标题，《终结大学，正如我们所知》(End the University as We Know It)，让人感觉到他这一提议的野心勃勃的——也是夸张的——目标。在他看来，财政上的崩溃在学校里已经造成了危机，而这会迫使学术界领导者们重组他们的机构，如果他们还想在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下生存下去的话。

Taylor，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

主任，曾长期在威廉姆斯学院任人文学科教授，他决定把这一论文扩大成一本书，因为这篇论文引起了很大反响。他写道，“我对高等教育现状的分析和改革建议引起了讨论与争议的风暴。”嗯，也许吧——但是如果他让他的立场宣言保持简短，会对这一争议更有益。

Taylor的书，很不幸地，读起来像是拉长了的观点文章，长于论断和提议，短于分析和证据支持。他阐述了很多建议，但没有几个是新的或是大胆的。像Hacker和Dreifus以及他们之前很多人一样，他想要废止终身教职制度，主要是为了给年轻学者提供机会，这些年轻学者花了很多年才取得博士学位，却发现当他们完成学位的时候找不到工作了（尽管这在他们开始学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秘密）。正如其他批评家那样，他认为大学鼓励学术研究，是以教学为代价的。他极力主张在精英和非精英学府之间的全国性合作，来培养和奖励好的教师，这是一个好主意。他认为计算机和视频游戏应该广泛用于提高教学质量，并打破学科之间的障碍，他甚至提议大学应该重组，以便反映计算机网络的开放性和适应性特征。

Taylor特别喜欢发起交叉学科的活动，把不同领域的——比如艺术和物理，或者宗教和国际关系——学者们放到一起来解决新问题。有很多教授抵制这样的合作，他们更喜欢专注于他们自己领域的事物。与此同时，在一些主要大学，这一类学科间和交叉学科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领域之

间的新结合持续地进化出新的学科，比如地域科学，生物化学，科学史，社会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但是这些领域是从现有的学科进化出来的，并不是从头开始的，正如Taylor所喜欢的那样。

Taylor的确有一些主意是新的和大胆的，但是它们并不一定有建设性或者可行。他来了个怪诞的建议，要取消永久性的院系，并改组现有的领域来研究一些特定事物比如水、时间、金钱、法律和网络。几年以后，当这些领域已经被研究得差不多了，它们就应该消亡，而新的领域则根据师生们的短暂兴趣而产生。研究生可以在任何这些临时的领域取得高级学位，也许就制作一些电影，视频游戏，或者新网站，来替代传统的书面论文。只要大学采取这种方式来运行，就不可能不把它的教授们变成业余人员，学生们变成稍纵即逝的时尚的倒影。对于科学家们如何进行工作，或者他们如何在勤勉而费时的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知识系统，Taylor并没有表现出太多赞赏。有些教授被想象力所控制，飞一飞倒也不错，但还得有另一些脚踏实地才好。

对于人文学科作为一个把过去的教训与成就代代相传的领域，Taylor也并不是特别同情。他是新事物的热衷者：新技术，新学习方法，以及未经测试的学术新结构。很少看见一个人文主义者兼哲学家如此彻头彻尾地沉迷于计算机和网络的各种可能性，这毫无疑问地意味着他对这些知道得不够。Taylor的提议真的会“终结大学，如我们所知。”这

会是好事吗？大学的确需要改革，但是不必是这样的颠覆——至少现在不。

Taylor至少在一点上无疑是对的：财政崩溃和长时间的萧条无疑会给大学带来新的压力，迫使它们裁剪开支和剔除多余的课程和人员。他所说的“高等教育泡沫”正在破裂中，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泡沫一样。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当代的大学是战后美国繁荣的产物，并逐渐走向尽头。上升的学费和工资，行政超负荷，捐助额的一再翻番，都多多少少是稳步增长的经济和前所未有的牛市（以及国家能够无限借钱的能力）的反映。当资源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当家庭再也无法负担当前的学费，当联邦收回其资助，大学的领导者将对保持近几十年来的收入感到更大的压力。从富裕而生出的高等教育当前的很多冗余，都会在新的节俭时代里面得到解决。

如果有人让我以这些书中所含的信息为基础，就高等教育改革的优先方案列一个小清单的话，我会着重以下几点：

（1）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上大学，还有所谓一个国家的繁荣取决于其全民上大学的这些乌托邦思想要收起来。很多年轻人对于上大学既没有准备也没有动力。让他们去为就业做准备。试图把他们硬推进大学，会削弱大学，损害所有其他人。

（2）终止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课程。把一些能干的人放进这些随后找不到工作的研究领域里面培养，没什么意义。企业式的研究已经把所有这些领域都给败

坏了,特别是在人文领域。

(3) 在这些领域建立一些课程,允许学生通过教书而不是研究来取得学位。这些课程应该达到知识上的宽广而不是精深,而且会使得毕业生有能力在人文的数个领域进行教学。这会加强人文学科的教学,也许还能使其从现有状况中复兴。

(4) 逆转行政层的扩张,特别是为了满足校园里那些有政治诉求的团体而存在的办公室和课程。如果校园团体想要他们自己的行政办公室,他们应该自己付钱,而不是让其他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来付钱。大学应该施行这样的举措,即在雇佣一个行政人员的同时,雇佣至少三个教授。

(5) 恢复原有的教育要求和核心课程,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接触到科学与人文的那些

造就了我们的文明的重要思想。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有个名叫“伟大的书”的课程,而其他院校则采用一系列科学与人文的问卷课程的形式。去做,比怎么做要更重要一些。

尽管这些教授们大多都是处于自由主义的视角,高等教育仍然是最保守的行业之一。它的组织形式在过去的几代已经逐渐进化了,而它对于改革非常抗拒,特别是那些批发式的改革和重组。在最近几十年中,它更多地是在瓦解而不是改革。我们不应该认为以上这些或者书中讨论过的建议会在近期内实行。它们只是代表了一个长期的对话。虽然有Taylor博士的言论,但未来的大学很可能还会看起来像是今天这样,只是它们会使用更少的资源来运转,更少的余额可供浪费。Q

1. Higher Education: How Colleges Are Wasting Our Money and Failing Our Kids—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by Andrew Hacker & Claudia Dreifus; Henry Holt & Company, 271 pages, \$26.

2. 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 by Richard Arum and Josipa Rok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59 pages, \$70.

3. Crisis on Campus: A Bold Plan for Reforming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Mark C. Taylor; Knopf, 256 pages, \$24.

原载: The New Criterion, Volume 30, September 2011



终极之上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